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八十四本，第一分

出版日期：民國一〇二年三月

## 明清時期江漢平原里甲制度的 實行及其變革

魯西奇、徐斌\*

明初里甲制度在各地區推行過程中，表現出多種多樣的形式；各地區里甲制在明清時期的變革之跡，亦有很大差異。本文以江漢平原諸州縣（漢陽、漢川、沔陽、潛江、景陵〔天門〕、監利等）為中心，討論里甲制在這一區域的實行及其變革，認為：明初江漢平原諸州縣編排黃冊里甲，主要集中在已經開發的平原邊緣低崗丘陵和腹地地勢較高的圍垸地區；散布於低窪湖區、「開辦」河湖水域、承納魚課的漁戶，則作為「業戶」被編入由河泊所管領的「業甲」，並未納入黃冊里甲系統。進入江漢平原的客民則多未入籍，其所墾垸田也多未徵科，或僅以「漁戶」身分交納「湖租」。明中後期，地方官府不斷通過清田、新編附籍里甲等手段，努力控制新墾垸田及垸民；在這一過程中，有部分新墾垸田起科納賦，也有少數垸民入籍，或由河泊所「業戶」轉變為里甲戶。清前中期，江漢平原諸州縣漸次推行按田糧編排里甲的做法，按田歸垸、按垸歸鄉，里甲遂得以落實到具有明確地域範圍的「圍垸」上，變質為以田糧為基礎、以垸為具體地域範圍的賦役徵科單位。

關鍵詞：里甲制 江漢平原 漁戶 圍垸

---

\* 廈門大學歷史學系、武漢大學歷史學院

## 引言

明清時期特別是明代里甲制度在各地區的實行及其變革，學術界雖有部分討論，然受到資料限制，論者大多主要引述里甲制度的有關規定，結合地方志的有關記載而加以推衍，從而形成對不同地區里甲制度實施及其變革之跡的認識：

（一）由於今見地方志有關洪武年間在各州縣推行里甲制度的記載較為詳悉，相關戶口資料亦相對完備，大多數研究者相信，洪武年間里甲制度在各地區曾得到切實推行。（二）至明中後期，地方志所載的各州縣著籍戶口普遍下降，文獻中亦有大量有關里甲制下編戶逃亡的記載，遂使人們得出里甲制逐步鬆動乃至崩解的認識。（三）清初順治、康熙年間，厲行整頓里甲，編制「更名」里、社，並將部分衛所軍戶編入民甲；同時，編審里甲主要以田糧為準，即按糧定里，里甲遂演變為賦役徵收體系中的納稅單位，漸次與實際地域範圍相脫離；里甲既漸次脫離實際地域範圍而實為一種納稅單位，明代中後期即已在部分州縣實行、清初復厲行推廣、以治安為主要職能的保甲制遂逐步取代里甲制，成為集治安、編戶、催徵於一身的鄉村基層組織。<sup>1</sup>

上述有關里甲制在各地區實施及其變革之跡的認識，有賴於制度史研究與地方志記載分析的結合，它有一個重要前提，即認為里甲制度在各地區的推行及其變革，是與王朝國家及其地方官府的控制能力、行政效能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在

---

<sup>1</sup> 大部分地方史或區域史研究著作論及明清時期里甲制度在當地的實施及其變革時，都基本遵循這樣的研究理路。如張建民著《湖北通史·明清卷》第一章論及明代里甲制在湖北地區的實施及其演變時，就首先引述《明會典》、《明實錄》、《圖書編》等文獻所記里甲制度的有關規定，然後引證嘉靖《湖廣圖經志書》等地方志書的記載，以說明「里甲制度在明代湖北境內得到較為切實普遍的推行，特別是明前期」；復引證嘉靖《蘄水縣志》等材料，以說明湖北「許多州縣到明晚期都出現了鄉無全里、里無全甲的現象」，「編查戶口、催徵錢糧、勸督農耕、協調關係，協理訴訟諸職能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影響」；而「里甲制度在明後期的崩潰導致了保甲制度的出臺。」（張建民，《湖北通史·明清卷》〔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頁23-37）作者從事明清時期長江中游地區社會經濟史研究多年，這些認識都曾是我們開展相關研究的出發點，我們早年的論著也多遵循這一研究理路並認同乃至闡發上述觀點（魯西奇，《區域歷史地理研究：對象與方法——漢水流域的個案考察》〔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00〕，頁418-435；楊國安，《明清兩湖地區基層組織與鄉村社會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4〕，頁28-76），所以，我們無意於全面否定這一研究理路的意義及諸多地方史或區域史研究者在這方面的貢獻，只是試圖說明我們已經認識到它的局限性。

王朝國家具有較強控制能力和行政效能的明初和清前期，里甲制度在各地區均得到較為切實的推行（雖然其進展有先後之別）；明中後期，官府控制力與行政效能既漸次下降，里甲制遂逐步鬆動乃至崩解。然這一前提實有進一步辨析之必要。首先，如所周知，明初的里甲制度是以江南地區基層社會組織為基礎設計出來的理想化模型，將這一整齊劃一的里甲制施行到各個地方時，必然要與當地社會經濟條件特別是既有的社會組織相結合，作出調整，因而，各地區建立起來的里甲體制，「在基本原則一致的大前提下，往往表現出多種多樣的形式。」<sup>2</sup> 所以，不能僅僅根據明初王朝國家強有力的控制能力和行政效能，就得出各地均已切實有效地按照制度規定建立起整齊劃一的里甲體制的結論。其次，自洪武以迄嘉靖乃至隆慶、萬曆，各地區經濟開發與社會發展的進程不一，所產生的社會經濟問題亦各異，各地方官府所面臨的財政、社會管理問題及其所採取的應對之策各不相同，凡此，都會對各地區里甲體制的變革產生重要影響。所以，各不同地區里甲體制在明清時期的變革之跡，不可能是一致的。

因此，欲探究明清時期里甲制度在各地區的實行及其變革，必須將里甲制度「還原到」或「置入於」特定地區社會經濟的發展歷程中，將其與當地具體的經濟發展、社會結構乃至文化變遷結合起來，仔細辨析地方志等相關文獻記載，綜合運用檔案文書、家譜資料等民間文獻及田野考察方法，探究：（一）明初在各地推行里甲制度時，是在怎樣的社會經濟背景下，與當地既有的社會組織相結合，建立起里甲體制的？（二）明前期以迄明中後期，當地的社會經濟究竟發生了哪些變化，產生了怎樣的問題，影響或導致了里甲體制的變化？（三）地方官府對於這些問題的應對之策如何？它們與王朝國家的全國性政策和制度變遷之間有怎樣的關係？（四）清初地方官府在整頓里甲體制時所面臨的地方社會經濟形勢如何？其應對辦法及其根據是什麼？它們對里甲體制的變革究竟發揮了怎樣的作用？（五）清代里甲是否確如許多制度史研究者所認定的那樣，已經脫離具體地域範圍，成為賦役徵收體系中的一種納稅單位？

顯然，這種研究理路必須落實到具體的地區範圍裏，部分學者沿著這一理路也作出了很有價值的探索。<sup>3</sup> 本文即在我們多年來從事江漢平原歷史地理與社會

<sup>2</sup> 劉志偉，《在國家與社會之間——明清廣東地區里甲賦役制度與鄉村社會》（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頁7。

<sup>3</sup>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學者遵循將制度變遷與地方社會相結合的研究理路，探究明清時期里甲制度在各地區的實行及其變革，最具影響力的成果是劉志偉，《在國家與社會之間——

經濟史考察的基礎上，主要運用地方志、檔案與族譜資料，結合田野考察所得認識，初步梳理明清時期江漢平原諸州縣（漢陽縣、漢川縣、沔陽州、潛江縣、天門縣〔景陵縣〕、監利縣等）里甲制的實施及其變革情形，以為釐清里甲制度在各地區的實施與變革提供一個區域性的實證基礎。

## 一・明初江漢平原的聚落分布與里甲編排

在江漢平原圍垸大興之前，人們主要居住在平原邊緣的低崗丘陵及平原腹地地勢略高的岡阜、小丘或人工堆築的墩、臺上。在江漢平原諸州縣中，天門（景陵）北境、漢陽東南境、漢川東南境及江陵西北境處平原邊緣，低崗殘丘較多，地勢稍高。乾隆《天門縣志》卷一〈地理考〉「風俗」稱：「村落惟依高阜而居，多星布棋錯，族處者仍不相遠。桑柘影處，廬舍出焉。村或百餘家，或數十家，吉慶則釀飲相賀，疾喪則斂貲相恤，猶有古風。」<sup>4</sup> 乾隆《漢陽縣志》卷七〈堤防〉末總論漢陽縣水利情形稱：「漢陽邑境約方百里，大都為山者十之二，為土田、為廛市村舍者十之三，而水居其半。當夏秋之際，重湖千頃，晶淼無垠，不

---

明清廣東地區里甲制度與鄉村社會》（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7初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增訂本）；鄭振滿，〈明清福建的里甲戶籍與家族組織〉，《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9.2：38-44，後收入氏著，《鄉族與國家：多元視野中的閩台傳統社會》（北京：三聯書店，2009），頁117-131；鄭振滿，〈明清福建里社組織的演變〉，《鄉族與國家》，頁238-253；Huang Ch'ing-lien（黃清連），“The Li-chia System in Ming Times and its Operation in Ying-t'ien Prefecture 明代的里甲制及其在應天府的施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4.4（1983）：103-156。相關的研究還有：周玉英，〈明中葉福建惠安縣里甲狀況探析〉，《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2.4：46-51；周紹泉，〈徽州文書所見明末清初的糧長、里長和老人〉，《中國史研究》1998.1：150-165；權仁溶，〈從祁門縣「謝氏紛爭」看明末徽州的土地丈量與里甲制〉，《歷史研究》2000.1：86-93；權仁溶，〈明代徽州里的編制與增減〉，《上海師範大學學報》2005.4：58-66；權仁溶，〈清初徽州的里編制和增圖〉，《上海師範大學學報》2007.3：100-106；賀喜，〈編戶齊民與身份認同：明前期海南里甲制度的推行與地方社會之轉變〉，《中國社會科學》2006.6：184-198；劉永華、鄭榕，〈清初中國東南地區的糧戶歸宗改革——來自閩南的例證〉，《中國經濟史研究》2008.4：81-87等。

<sup>4</sup> 乾隆《天門縣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湖北府縣志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第44冊，據民國十一年石印本影印），卷一，〈地理考〉，「風俗」欄，頁383。

獨秧針麥浪盡委波臣，而室家飄搖，鴻雁之哀，無歲或免。」<sup>5</sup> 天門、漢陽二縣至乾隆前期尚且如此，處於平原腹地的沔陽、潛江、監利及江陵東南部、荊門東南部和天門、漢川二縣大部分地區，地勢更為低窪，其明初之情形自可想見。<sup>6</sup> 嘉靖三年（1524），沔陽知州儲洵上疏論沔陽堤防利害云：「（沔陽）南臨大江，北枕襄漢，……地勢卑窪，湖泊相連，正係江漢下流，原無岡阜障蔽，諸水奔赴，若就大壑，民田惟土築圩院，防衛耕種。」<sup>7</sup> 嘉慶二十一至二十三年間（1816-1818）任漢川知縣的樊鍾英在〈通稟漢川地方情形民間疾苦〉中說：

漢川地處襄江下游，形勢低窪，……素稱澤國，除梅城、長城兩鄉地處高阜，其餘盡屬垸畝。每年泛漲，不破堤，僅廠畝被淹，若破堤，則垸內亦淹。……民廬多居墩、臺。墩者，乃民間鋤土造築而成。若水淹久，則墩、臺亦多坍卸，故居民多造茅屋竹籬，略加牆垣。夏秋水至，則拆屋移居，撐船遠逃；春冬水退，則于（「刈」之誤）茅索陶，亟其乘屋。<sup>8</sup>

顯然，在人們普遍圍墾垸田、堆築墩臺以定居止之前，江漢平原腹地的低窪湖澤之區實難以穩定地居住，更無法持續墾殖田地。

當洪武間江漢平原諸州縣推行里甲制時，垸田的大規模開發才剛剛起步，<sup>9</sup> 人們仍然主要居住在此前已經開發的低崗丘陵及部分地勢較高的圍垸地區，所以，里甲的編排大抵也主要是在這些地區開展。景陵縣（天門縣）大抵以義河（今天門河）為界，其北地勢較高，有五華山、青山、天門山、巾戌山等連綿蜿

<sup>5</sup> 乾隆《漢陽縣志》（收入《稀見中國地方志匯刊》〔北京：中國書店，1992〕，第36冊，據乾隆十三年刻本影印），卷七，〈堤防〉，頁93。

<sup>6</sup> 魯西奇，《區域歷史地理研究》，頁512-515；魯西奇，〈漢宋間長江中游地區的鄉村聚落形態及其演變〉，《歷史地理》23（2008）：128-151；魯西奇、韓軻軻，〈散村的形成及其演變——以江漢平原腹地的鄉村聚落形態及其演變為中心〉，《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11.4：77-91。

<sup>7</sup> 嘉靖《沔陽志》（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上海：上海古籍書店，1961-1966〕，據明嘉靖刻本影印），卷八，〈河防〉，頁5。

<sup>8</sup> 同治《漢川縣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湖北府縣志輯》第9冊，據同治十年刻本影印），卷一〇，〈民賦志〉，頁240。

<sup>9</sup> 關於江漢平原垸田開發的研究，請參閱石泉、張國雄，〈江漢平原的垸田興起於何時〉，《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88.1：131-140；彭雨新、張建民，《明清長江流域農業水利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3），頁184-268；梅莉、張國雄、晏昌貴，《兩湖平原開發探源》（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頁87-102；魯西奇，《區域歷史地理研究》，頁438-445。

蜒的低山丘陵；其南則地勢低窪，漢水及其分支牛蹄河、獅子河、馬腸河、清水汀河、陶溪潭河流經其間，東南境更是沼澤湖區，有澧馬潭、白雲三汊、葫蘆三灣、下帳湖、上帳湖、蒿臺湖等湖泊。<sup>10</sup> 嘉靖《沔陽志》卷六〈提封下〉記景陵縣坊廂村里，謂有坊廂二（坊一，縣城內；廂一，縣城外），村六，里二十有三（據其下文所記統計，實為二十四里）。嘉靖《湖廣圖經志書》卷一一〈沔陽州〉「坊鄉」所記與此同。<sup>11</sup> 萬曆《承天府志》卷六〈民數〉謂景陵縣「原額二十四里」。<sup>12</sup> 則此二十四里之制，當即洪武中所編排的里數。其中，上白湖村在縣西北境，領馬溪、巾港、青山、洲上四里；下白湖村在縣西南境，領永和、永豐、泰寧、安和四里；雲潭村在縣東北境，領東林、諸流、蕭城、仁和四里；官城村，在縣東境，領興仁、仁和、三才、白雲、仁平五里。此四村十七里，除下白湖村處義河上游、兼跨義河兩岸地外，其餘皆處於義河之北。然則，洪武間在義河北岸至少有十五個「里」。方樂村所領永平、安平、泰平、和平四里，大抵在義河與漢水分流牛蹄河之間，靠近縣城；南黃村所領泗江、獅子、崇進三里，則當在牛蹄河以南，包括了漢水以南地區。則在義河中下游南岸地區，當有七個里（若加上上游南岸、屬於下白湖村的二里，則為九個里）。<sup>13</sup> 明清時期景陵（天門）縣的南境包括今仙桃市北境的漢水以南、通順河以北地區，地域面積遠大於義河北岸的北境，而洪武間編排的里數則少於北境，說明其時湖澤地區尚未得到開發，可能並未編排里甲。

漢陽縣洪武年間的二十八里，到嘉靖中朱衣編纂《漢陽府志》時，只剩下十九里，所以很難據以討論洪武年間各里的分布。然嘉慶《漢陽縣志》卷八〈堤防志〉詳記「漢陽十九里地形高下」，卷一二〈戶口保甲〉復記有各里所屬村落，我們嘗據以復原清中後期漢陽縣各里之今地範圍及所包括的村落。如玉一里（當即

<sup>10</sup> 嘉靖《沔陽志》卷五，〈提封上〉，「山」，頁4，12-13；卷六，〈提封下〉，「川」，頁1-3。

<sup>11</sup> 嘉靖《湖廣圖經志書》（收入《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0〕，據日本尊經閣文庫藏嘉靖元年刻本影印），卷一一，〈沔陽州〉，「坊鄉」欄，頁966。

<sup>12</sup> 萬曆《承天府志》（收入《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據日本尊經閣文庫藏萬曆三十年刻本影印），卷六，〈民數〉，頁102。

<sup>13</sup> 嘉靖《沔陽志》卷六，〈提封下〉，頁8-9。明代景陵縣六村二十四里之制的考定復原，根據康熙《景陵縣志》（康熙三十二年刻本，國家圖書館藏縮微膠捲）卷三〈輿地〉「坊村」、乾隆《天門縣志》卷一〈地理考〉及湖北省天門縣地名領導小組辦公室編《湖北省天門縣地名志》（湖北天門，1982）及實地調查。

嘉靖《漢陽府志》所記之玉山鄉一圖）所屬有南湖嘴、張大渡、季余家垸、寶家嘴、洪山廟、黃沙廟、尉武山、補鍋嶺、鴨港橋等九個村落，「唯尉武山、補鍋嶺、鴨港橋三村皆係尉武山為屏障，形勢較高，餘村並無岡陵，均畏官湖、南湖水漲。」可以相信，在官湖、南湖堤垸興修之前，玉一里居民主要居住在尉武山周圍地勢較高的三個村子裏，明初的玉山鄉一里很可能就是以尉武山、補鍋嶺、鴨港橋三個自然村落為基礎編排的。又如山三里（當即明代的山陽鄉三圖），位於漢陽縣西南境（今漢陽區蒲潭一帶），其南濱大江，西臨太白湖，北依蒲潭山。在嘉慶年間有上蒲潭、香爐山等十三個村落。其中，位於山麓的上蒲潭、周家河、水南（分為上下）三村建村較早，而地勢低窪的灘頭、東莊、南莊等村建村最晚。據此，我們揣測洪武中編排山陽鄉三圖時，所能控制的村落大抵就是位於山麓的上蒲潭、周家河、水南等村。<sup>14</sup>

沔陽州全境均介於江漢之間，是江漢平原的腹心地帶，除東南境與漢陽交界處有黃蓬山外，境內只有長江、漢水及其支流蘆汊河、長夏河等河流兩側的自然堤地勢稍高。因此，自古以來，人們主要居住在這些河流兩岸的自然堤上。南宋乾道六年（1170），陸游溯江入蜀，於九月一日在漢陽通濟口離開大江，轉入沌中，溯沌水（即明清時期的長夏河、大馬長川）而上，沿途所經之村落，即多位於地勢高爽之處。如其時屬玉沙縣滄浪鄉的畢家池，「地勢爽塏，居民頗眾。有一二家，雖茅茨結廬，而窗戶整潔，藩籬堅壯，舍旁有果園甚盛，蓋亦一聚之雄也。」其地又有廣福永固寺、東場，「並水皆茂竹高林，隄淨如掃，雞犬閒暇，鳬鴨浮沒，人往來林樾間。」<sup>15</sup> 可以想見，二百餘年後，當明朝官府在沔陽州編排里甲時，人民居住分布之情形當與陸游所見大致相同。嘉靖《沔陽志》卷六〈提封下〉記沔陽州有坊廂五、村三十八，並列舉三十八村之目及其相對於州城之方位、距離，其中除「新增」一村外，其餘五坊廂、三十七村（當即三十七里）可信洪武間已置。<sup>16</sup> 其中，五坊廂在州城內外；三十七村（里）中，漕河（州北三

<sup>14</sup> 嘉慶《漢陽縣志》（嘉慶二十三年刻本，湖北省圖書館藏），卷八，〈堤防志〉，「漢陽十九里地形高下」，頁 7-8；卷一二，〈戶口保甲〉，頁 10-14。此處之認識，主要根據二〇〇二年十一月二至四日在當地的調查。

<sup>15</sup> 陸游，《入蜀記》（《知不足齋叢書》本；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本，1999），卷五，頁 4-5。

<sup>16</sup> 嘉靖《沔陽志》卷六，〈提封下〉，頁 8。此處所記各「村」之性質，仍可基本斷定當即「里」，蓋萬曆《承天府志》卷六〈民數〉稱沔陽州編戶為「三十六里」（頁 102），下載萬曆二十年「原軍民雜役人戶」數，則三十六里之制當為萬曆中的編制。而嘉靖《沔陽

里)、石板(州西五里)、漢廣(州東五里)、江北(州東北三里)四村可以斷定即在流經沔陽州城的漕河兩岸,茅埠(州西南一百五十里,當即在同書卷五〈提封上〉「川」所記大江北岸的茅埠口,其地後來興起了茅鎮)、林灣(州西南一百五十里,當即長江北岸的竹林灣)二村當在長江北岸江堤上,南池(州西北七十里)、渣潭(州東北三十五里)、直步(州東南五十里,或即陸游昔年所見之「綱步」,位於蘆汊河與長夏河匯合處)三村當位於漢水分流河道蘆汊河兩岸,深江(州北九十里)、剝河(州北六十里)、西范(州東北七十里,當即范溉關,其地後來興起了范溉市)、黃荊(州東北八十里,當即排沙河進入下帳湖的黃荊口)等四村當位於蘆汊河北面支流排沙河兩岸,長夏(州南四十里)、滄浪(州東五十里,當即在昔年陸游所見之畢家池附近)二村當位於長夏河兩岸,黃蓬(州西南一百五十里,其地後來興起了黃蓬市)、上平放(州南四十里)、下平放(州南一百三十里)三村當位於長江分流復車河兩岸。沔陽州境內湖泊密布,然在三十七村中,大致可以斷定瀕湖者只有西湖(州西南一百五十里)、石湖(州北四十五里,當近百石湖,至明中期,百石湖邊已築有長堤)二村,境內大湖如太白湖(在沔陽州東南境,周二百餘里)、沙湖(與太白湖相連)、陽名湖、白鷺湖、黃蓬湖(在沔陽州南境,即洪湖之前身)等湖泊周圍均未見置有村里。<sup>17</sup> 因此,雖然無法逐一考定上述三十七村之所在,但可以想見:當洪武間編排沔陽州里甲

---

志》所記之五坊廂、三十八村則當為嘉靖中的編制。二者相距非遠,三十六里之制應當是在五坊廂、三十八村之制基礎上演化而來。嘉靖《沔陽志》卷八〈河防〉錄嘉靖三年知州儲洵之言,謂若川江水發,監利車木堤水口衝塌,「沔陽後澤、茅埠凡一十六村,熊家、浮潭凡四十餘垵稅糧八千餘石高低淹沒,尺土不堪耕種」;若襄漢水發,潛江排沙頭諸處水口衝塌,「沔陽深江、西范凡二十七村,蓮河、柘樹凡七十餘垵稅糧一萬五千餘石亦無尺土耕種。」(頁6)顯然,後澤、茅埠、深江、西范等四十三村(當是五坊廂三十八村之和)應即四十三里。最為重要的是,在雍正年間沔陽知州禹殿鼈主持編排的鄉圖中,仍多存有嘉靖《沔陽志》所記的諸村之目,而名之為「里」,如東安悅安鄉所領四圖二十里中有漢廣里、渣潭里、馬宗里、滄浪里、泗江里、接陽里,西方寶成鄉四圖十七里中有石板里、石湖里、雲潭里、漕河里、鐵櫃里、剝河里、西范里、深江里、南池里等。其下按語稱:「沔地自明迄今,區分方域,編載田賦,糧田四十三里。」(乾隆《沔陽州志》〔乾隆八年刻本,湖北省圖書館藏〕,卷三〈提封〉,「鄉圖」)其所說之「四十三里」,當即五坊廂三十八村。

<sup>17</sup> 此處關於沔陽州三十七村(里)所在位置的考定復原,主要根據嘉靖《沔陽志》卷五〈提封上〉的相關記載及作者此前關於漢水下游平原河流變遷與堤防建設的研究,每一地名之考定均甚為繁瑣,故此處無法一一注出。請參閱魯西奇、潘晟,《漢水中下游河道變遷與堤防》(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4),頁123-147,339-368。



時，大抵僅可在居於諸多河流自然堤、已初步圍墾的較高地帶的居民中推行，所以編成的里甲當主要沿河流自然堤分布，而在遠離河流自然堤或河流下游入湖地帶，則湖泊密布，其間雖散居眾多漁戶，卻並未編入里甲（見下文）。

## 二・河泊所〈甲冊〉的攢造與漁戶「業甲」的編排

如上所論，當明初推行里甲制時，江漢平原諸州縣，大抵皆僅可在已闢為土田、營築廬市村舍之區攢造黃冊、編排里甲。但平原腹地的低窪湖區並非無人居住。嘉靖《湖廣圖經志書》卷三〈漢陽府〉「風俗」引《漢川志》云：「民樸略，春夏力農，秋冬業漁。蓋其地雲夢之藪，當春水泛漲，農民遷居原隰耕墾；秋冬涸時，還移居就下，近湖泊網羅以自給。」<sup>18</sup> 康熙《漢陽府志》卷一〈輿地志〉「風俗」亦稱：

漢川四周皆水，湖居小民，以水為家，多結茭為簰，覆以茅茨，人口悉居其中，謂之茭簰。隨波上下，雖洪水稽天，不沒。凡種蒔牲畜、子女婚嫁，靡不於斯，至有延師教子弟者。其同塚一帶，土瘠民貧，西成之餘，即攜妻子乘漁艇，轉徙于沔之南、江之東，採茭拾蛤，至東作時仍歸事南畝。逐歲習以為常。<sup>19</sup>

這些漁戶漂泊河湖水域，居處不定，亦耕亦漁，早期則以漁為主。明初於南直隸、湖廣、浙、閩諸省河湖集中之區分置河泊所，以負責徵收漁課、管理漁戶。<sup>20</sup> 據嘉靖《漢陽府志》記載，漢陽縣領有長江局、三淪湖、平塘河、桑台海、馬影湖、蒲潭湖、新潭湖等七處河泊所，每所皆領管數處至數十處河湖水域。如馬影湖河泊所即領管貴子潭、貴子湖、天清湖、協山湖、豐門、龍船陂、

<sup>18</sup> 嘉靖《湖廣圖經志書》卷三，〈漢陽府〉，「風俗」欄，頁291。

<sup>19</sup> 康熙《漢陽府志》（康熙八年刻本，國家圖書館藏縮微膠捲），卷一，〈輿地志〉「風俗」。

<sup>20</sup> 參閱中村治兵衛，《中國漁業史の研究》（東京：刀水書房，1995），頁112-113；張建民，〈明代湖北的魚貢魚課與漁業〉，《江漢論壇》1998.5：45-49；尹玲玲，〈明代的漁政制度及其變遷——以機構設置沿革為例〉，《上海師範大學學報》2003.1：96-103；徐斌，〈明代河泊所的變遷與漁戶管理——以湖廣地區為中心〉，《江漢論壇》2008.12：84-88；徐斌，〈明清河泊所赤曆冊研究——以湖北地區為中心〉，《中國農史》2011.2：65-77。

高作陂、夫人港等六十七處河湖水域。<sup>21</sup> 除漢陽縣七所外，沔陽州與景陵縣共有三十一所，江陵縣有五所，漢川、監利、鍾祥三縣各有三所，孝感縣有二所，應城、安陸二縣各有一所，故明初江漢平原諸州縣境內，共有五十六個河泊所。<sup>22</sup>

凡此五十六個河泊所，可能大部分均置於朱元璋控制湖廣地區的甲辰歲(1364)至洪武初年間。<sup>23</sup> 河泊所設置後，即可能對所轄水域、漁戶展開清理工作，丈量水域面積，編排漁戶戶帖，核定漁課課額。洪武間婺州詩人童冀〈漁蕩行〉句云：

永州江清稀見魚，永民歲歲輸魚租。當年差官開湖蕩，尺水從茲起波浪。  
江濱湖岸多沙洲，一望不見天盡頭。常時風色黃塵起，一夜雨聲潢潦流。  
丈量繩引計頃畝，半抑編氓強分受。黃綾大冊書入官，歲歲催糧煩甲

<sup>21</sup> 嘉靖《漢陽府志》（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據明嘉靖刻本影印），卷三，〈創置志〉，頁24；卷二，〈方域志〉，頁29-35。

<sup>22</sup> 據嘉靖《湖廣圖經志書》卷三〈漢陽府〉（頁284-285）、卷五〈德安府〉（頁426-427）、〈荊州府〉（頁510-511）、卷一〇〈安陸州〉（頁935）、卷一一〈沔陽州〉（頁967-968），嘉靖《沔陽志》卷七〈創設志〉（頁7），嘉靖《漢陽府志》卷三〈創置志〉（頁43）。潛江縣未見置有河泊所的記載，其境內河湖漁課分屬江陵縣倚北湖河泊所、監利縣分鹽河泊所、沔陽州剏河河泊所、景陵縣葫蘆三灣河泊所徵收，見康熙《潛江縣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湖北府縣志輯》第46冊，據光緒五年增刻本影印），卷三〈輿地志〉「鄉區」下所錄萬曆三年（1577）潛江知縣朱熙洽〈請清漁糧詳文〉，頁48。

<sup>23</sup> 嘉靖《漢陽府志》卷三〈創置志〉並未載明漢陽縣七河泊所與漢川縣三河泊所的設置時間。嘉靖《沔陽志》卷七〈創設志〉亦未載明沔陽州及景陵縣各河泊所的始置時間，僅在按語中稱：「國初河泊所有長下河、官港湖、螺子瀆、西港湖、烏流湖、千金湖、剏口百石湖、青山湖、黃蓬湖、賽港湖，統三十有一。」（頁7）其所說之「國初」，至少可理解為洪武間。嘉靖《湖廣圖經志書》卷六〈荊州府〉「公署」欄記監利縣領大長馬河、家綠湖、分鹽河三河泊所，「俱洪武初建」。（頁511）同書卷一〇〈安陸州〉「公署」欄記鍾祥縣所領河泊所，謂城北湖河泊所「洪武乙巳年開設」（按：當為吳王乙巳年，即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赤馬野豬湖河泊所「洪武五年開設」，蘆洲湖河泊所「洪武初所官陳子晦創設」。（頁535）同書卷二〈武昌府〉「公署」欄記武昌縣領六河泊所，其中長港江套、西澧湖、炭門湖三河泊所俱「本朝甲辰年開設」，礮磯湖河泊所「丙午年開設」，馬欽漿湖河泊所「洪武元年開設」，烏翎湖河泊所「吳元年開設」。嘉魚縣所屬四河泊所，「俱洪武元年創」。（頁136）咸寧縣所屬咸寧湖河泊所「洪武十四年開設」。大冶縣所屬華家湖等三所，均開設於甲辰年。（頁137）同書卷四〈黃州府〉「公署」欄記黃岡縣所領九河泊所、黃梅縣所領六所「俱洪武初建」；蘄水縣所領圻湖河泊所建於洪武初，陽歷湖河泊所建於洪武中。（頁334-336）因此，我們認為江漢平原諸州縣所領諸河泊所，大部分當創設於甲辰歲至洪武初。

首。……君不聞道州魚課年年足，當年開課官不酷。<sup>24</sup>

據同書卷〈丁巳晦日立春〉「去歲三湘送雁行」句，知童冀永州之行當在洪武九年（丙辰）。然則，永州「差官開湖蕩」之事必在洪武九年之前。據童冀詩句所述，知其時差官「開」湖蕩，引繩丈量，計算頃畝，強迫「編氓分受」，並書入「黃綾大冊」（當即下文所見之「水魚鱗冊」或「甲冊」）。永州河湖水域非多，其湖蕩尚且需要如此大費周章地引繩丈量、造冊徵租，河湖縱橫的江漢平原諸州縣自更可想見。然其時承納漁課的編氓或屬於州縣里甲系統。黃岡《梅氏宗譜》中錄有一份梅氏在洪武三年立戶的「戶帖」抄件：

戶名圖式

一戶梅琅，係黃州府黃岡縣伍重鄉一圖戶。

男子四口。成丁一口，不成丁三口。本身，年三十七歲。男寄看，年四歲；虎兒，年三歲；碼兒，年二歲。

婦女一（「二」之誤）口。妻阿任，年三十二歲。姐梅，年四十八歲。

事產 茅屋三間。黃溪湖濠網業戶。

右戶帖付梅琅收執。準此。

洪武三年 月 日。

肆字七百號。<sup>25</sup>

伍重鄉在黃岡縣北境（上鄉在縣北一百里，下鄉在縣北一百二十里），境內有黃漢湖（又名武湖），<sup>26</sup> 則上引梅氏戶帖中的「黃溪湖」或當為「黃漢湖」之譌誤。戶帖未記梅氏擁有田產，但稱其為「黃溪（「漢」之誤）湖濠網業戶」，則其當為漁戶。黃漢湖河泊所是黃岡縣九河泊所之一，為「洪武初建」。<sup>27</sup> 然則，其時雖已設有河泊所，其所轄漁戶仍當編入州縣里甲系統。

河泊所管領漁戶的編排與納課應役，十分複雜。萬曆間，漢陽府人王光裕在〈七所魚課說〉中，追述明初本地編派魚課之況云：

本朝自則壤成賦之外，澤梁雖有禁，未嘗不酌魚利之多寡，因年歲之豐歉，小民之便否，分制七所，各隨地之所近，以便催徵。自洪、永以來，

<sup>24</sup> 童冀，《尚絅齋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第1229冊），卷三，〈漁蕩行〉，頁620。

<sup>25</sup> 黃岡《梅氏宗譜》（光緒五年樂道堂刊本，武漢大學圖書館藏），卷首，〈戶名起立〉。

<sup>26</sup> 弘治《黃州府志》（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據明弘治刻本影印），卷一，〈坊社鄉鎮〉，頁21；卷二，〈山川〉，頁24。

<sup>27</sup> 嘉靖《湖廣圖經志書》卷四，〈黃州府〉，「公署」欄，頁334。

以及宣德，先議鈔，後議課米。開國之初，法禁甚嚴，小民畏威，尚未懷德，每有湖業，輒不敢領。故布為功令，凡大小湖池有名可查、有地可稽者，責軍戶開辦，各領為業，取魚辦課。其湖水泛闊長且渺者，責令所官某、吏某，同經紀某、商客某，招集大網戶、淺網戶、扒網戶、岸罾戶、手罾戶、花罾戶等，魚利以月計，鈔課以利計，各分浪業，眾輕易舉。行之三朝而均平長久之法定矣。匯造赤曆，永為遵守。<sup>28</sup>

洪武、永樂間，「開辦」湖池、領以為業、承辦魚課的「軍戶」當然屬於州縣編戶，但卻未必就是實際以網魚為業的「漁戶」，其性質或即後來所謂之「湖頭」。作為魚課徵收機構的河泊所，直接掌握的就是這些承辦魚課的「湖頭」。後來又以河泊所所官、胥吏、經紀、客商招集各色漁戶，「各分浪業」（「浪業」當即「湖業」），所行也當是包稅之法，具體承辦魚課者，是那些「經紀」、「客商」；河泊所通過這些經紀、客商，掌握「各分浪業」的諸色漁戶。再後來，很可能在宣德間（1426-1435），方攢造赤曆，「永為遵守」。所謂「赤曆」，當即河泊所為徵收魚課、管理漁戶而編製的冊籍，一般包括本河泊所應承擔的魚課總額、隸屬於本所的漁戶編排分甲以及每戶應承擔的具體課額、漁戶各甲具體辦課的水域、辦理課程的具體數額等內容。<sup>29</sup>

湖北省檔案館藏〈順治四年黃岡零殘湖赤曆甲冊〉，反映了〈洪武赤曆甲冊〉的部分內容。<sup>30</sup> 它在「洪武赤曆甲冊編定」下首列「本府」（當即零殘湖河泊所）四季課鈔數及總數（鈔柒千柒百柒拾叁貫貳百文，有閏月加鈔伍拾貫）、子池業戶管解乾魚數（捌百伍拾叁斤，有閏月加柒拾斤）、子池折解黃白麻桐油熟鐵等數（肆千陸百伍拾叁斤壹拾肆兩肆錢）；然後錄「洪武年間赤曆編定甲冊輪流徵收麻鐵乾魚花名」，分為六甲，下列各甲所領漁戶花名，計六十戶（一甲十三戶，二甲九戶，三甲七戶，四甲七戶，五甲十二戶，六甲十二戶），每甲下將「乾魚」解戶單獨列出；再其次是「長江業戶陸拾肆名」之花名及其各自的課米數（以上三

<sup>28</sup> 萬曆《漢陽府志》（武漢：武漢出版社，2007），卷五，〈食貨〉，附王光裕，〈七所魚課說〉，頁109。

<sup>29</sup> 參閱徐斌，〈明清河泊所赤曆冊研究〉，頁65-77。

<sup>30</sup> 湖北省檔案館藏，〈最高法院、湖北省高等法院黃岡分院對張祖蔭、陳受二等湖業所有權糾紛案的判決，1948〉（LS7-2-534），附錄，〈順治四年黃岡零殘湖赤曆甲冊〉。這份文書將所抄錄的洪武赤曆甲冊的內容與清初順治年間的「見存」情況混在一起，但我們仍可以大致窺見洪武赤曆甲冊的基本結構與內容。本文以下所引即經過我們「還原」處理的洪武赤曆甲冊。

部分當屬於河泊所「赤曆」的一般內容，是官府登記應徵與交納諸色物品鈔課的會計簿；最後則是各業甲所領湖池水域、各戶承辦的具體課額（應即附編於「赤曆」之後的「甲冊」）。顯然，「甲冊」乃是所謂「赤曆甲冊」的核心內容。如：

一甲葉茂春。

一、子池：楊子下墩、芳墩、胡戚原港、香水汊、高家潑、出水溝、方家墩等處，地名坐落趕花畝，（原）課米捌拾貳石，業戶拾伍名。（見存陸名，迺絕玖名。業戶許再成、涂均保、余元五、桂政辦納課米叁拾伍石，迺絕戶黃興、蔡勝三、姚文吉、桂政清、許文斌、許十一、許再成、董興□九戶課米肆拾柒石。<sup>31</sup>）

一戶葉茂春，課米伍石。

一戶李文吉，課米伍石。

（以下從略，共十三戶。）

又「一甲乾魚解戶」（佚名，據同伴文書上列之六甲花戶冊，當為何興等六戶）下，記「子池何家湖、董家塢、嚴家汊、馬踐湖、泥河、天井湖，地名坐落楊兒港東北邊，約有十里，（原）開課米貳拾捌石貳斗貳升，舒勝一、余成、黃二共開課米拾柒石伍斗四升，何興（下殘）課米壹拾柒石伍斗肆升。內有剩食湖。」則一甲共有兩處「子池」，至少有二十一名業戶，共同課米一百一十石二斗二升。又如，在「二甲麻鐵解戶劉朝一」條下，載有「子池：沙河、土埭、梓潭港，地名坐落中和鄉」，下錄明受四等十八戶名及其各自課米若干；然後又記另三處「子池」，各有二、四、四名業戶，分別課米若干。則二甲當共有三處「子池」、二十六戶。在〈順治四年黃岡零殘湖赤曆甲冊〉之後，有一份「黃州府黃岡縣廣安鄉零殘湖河泊所業甲」李遵（五十歲）的供狀。<sup>32</sup> 李遵稱：

洪武年間，曾祖李宗傑，與在官劉臯即劉重三、張繼祖、黃榮、汪朝俊（未到）、胡興六、葉茂春、劉朝一、陳興、汪聰、胡勝三、陳四、汪伏、二船張七、劉興、陳受（並迺移）、戚子旻、盧佑、鄭旺共貳百貳拾壹

<sup>31</sup> 本件文書中所說之「原」當是指洪武時情形，「見存」當是指順治四年重定赤曆甲冊時的情形。

<sup>32</sup> 此項供狀頗多舛誤，不能通解，幸檔案中有兩份同一供狀的抄件，我們據之校補，得大致可讀。本文所引，即為校補後的文字。「李遵」，另一份抄件作「李尊」。本件文書殘缺不全，末尾已佚，故沒有明確紀年。然內中提及嘉靖十年（1531）「前項麻鐵料銀輪該遵戶收解」、「嘉靖十三年奉文」、「嘉靖十六年前項麻鐵錢糧又輪」及「本年十月內赴巡按老爺楊處告」等，故推測當繫於嘉靖二十年前後。

戶，俱開充本所業甲各一名。本所額辦乾魚捌百伍拾叁斤，額定未到業甲馬興隆等壹拾捌戶管辦；又開熟鐵叁千柒百貳拾伍斤陸兩肆錢，每斤額徵銀一分五釐，共銀伍拾伍兩八錢八分二釐；線繆八十八斤，每斤額徵銀七分，共銀六兩一錢六分；黃麻叁百六十柒斤，每斤額徵銀二分二釐，共銀一十四兩零二分五釐；白麻二百斤，每斤額徵價銀三分，共銀六兩。通共徵銀八十二兩七錢六分七釐，額定遵與吳興六等二十六戶名管辦。又開子池課米輪流徵解。又開府鈔銀二十七兩二貳錢六分，額定劉阜興、胡勝三等七戶額於長江百業辦解。遵祖開子池駝坑、尹家壩、楊家澇等處，議課米一十五石；張繼祖開長港、紅蓮坑等處，議課米三石柒斗；黃榮開蓮湖港、沙湖等處，課米二十四石；劉重三開新生洲、江套，課米三石五斗；吳興六開萬子湖等處，議課米六十四石八斗；陳興開小長河腹內壩等處湖，議課米一百五十四石六斗；葉茂春開揚子壩、香子汊等處湖，議課米叁拾伍石；劉朝一開走長沙河七里、萍東流湖、黃家汊等處，議課米一百一十三石。

李遵列舉的洪武間開充零殘湖河泊所業甲的戶名中，有「葉茂春」，亦見於上引洪武甲冊所列花戶名單，為一甲中的第一戶；一甲中又有「李原吉」，或即李遵所稱的曾祖「李宗傑」。然則，其時曾充零殘湖河泊所業戶者共有二百二十一戶，而承辦乾魚、熟鐵、府鈔者合計為五十一戶，則此五十一戶，以李遵之例推之，皆當為「業甲」。

湖北省檔案館另藏有一份〈萬曆十七年金東西水魚鱗冊〉（抄件），<sup>33</sup> 原係武昌府江夏縣金口壩河泊所「為改編湖課以徵幹魚□□魚鮓鈔銀事」上報而編製的，內稱：

切照本所西水總先年十八總業甲，□□應□□戶陸續逃亡，湖業荒蕪，錢糧累及當在業甲，無（「今」之誤）憑大小業戶公同議論，逃亡豁除，活存實派，湖池柞場畧□就分管。現徵實在稞米五百四十六石貳斗五升，每石派銀一錢七分五厘四毫。量戶分載，照米鋪銀。編立四總，共計一十貳名。四名承應一年，各依冊定銀米數目，各收各解，永為定規。自今十七年為始，已後輪流徵解，毋致混亂。理合造冊，頂立冊者。

<sup>33</sup> 湖北省檔案館藏，〈湖北省高等法院對蒲圻縣民王明新、余新祥等湖地共有權糾紛案的判決，1948〉（LS7-2-302），附錄，〈萬曆十七年金東西水魚鱗冊〉。

其下先錄「西水總實徵」稞米（五百四十六石貳斗五升）、乾魚（銀九兩五錢八分七釐四毫五絲七微五塵）、鮓魚（銀九兩八錢九分七釐）、鈔銀（十一兩八錢一分七釐）、麻鐵（銀六十四兩五錢七分二釐三毫九絲）之數；然後錄四總十二業甲、業戶之名及應承稞米數目，其格式是先載明湖池水域之所在及其四至，後錄在此湖池範圍內取魚為業的業甲業戶及其稞米之數。如：

一、額辦稞湖董塘池（外白石賽作官湖），東至八（下殘）鵝公礮為界，西至岳家邊為界，北至□山（下殘）。

業甲一名：鄧李畢。

一戶鄧樸，頂桂文興，稞米五石七斗。

一戶李春喬，稞米十石。

一戶鄧興效，頂尹金予，稞米十貳石。

一戶畢尚學，稞米一石九斗。

（下略，共十二戶）

以上各戶入董塘池取魚，共辦稞米五十九石八斗，該麻鐵銀十兩五錢九分五釐。

「業甲鄧李畢」之名，顯係鄧、李、畢三氏之合稱（十二業甲之目，多以此種方式命名）；而「鄧樸頂桂文興」、「鄧興效頂尹金予」，說明戶名已有改變，桂文興、尹金予既為編改前之戶名，則可推知此業甲在編改前並不稱為「鄧李畢」，它不過是此十二業戶（編改前未必為此數）共同擁有「入董塘池取魚」之業的名頭。據上引黃岡縣零殘湖之例推測，它可能最初是某一實在的漁戶。每一業甲名目之下，皆有業戶兩戶至十四戶不等（「業甲鄧李畢」十二戶，「業甲楊李王」九戶，「業甲王清谷」五戶，「業甲張陳何」二戶，「業甲湯曾徐」八戶，「業甲姚李王」六戶，「業甲吳任毛」十四戶，「業甲王欽宋」四戶，「業甲何湯甫」五戶，「業甲聶魯朱」五戶，「業甲何李龍」五戶，「業甲龍吳高」五戶）；每三個業甲又編為一總，「輪流應役」。

同卷宗另附有一份〈萬曆二十七年八月初九日給金東西水稞全冊〉，其格式是先於各業甲名下載明「額辦」湖池水面及稞米數額，然後錄各業戶名目及其稞米數，與〈萬曆十七年金東西水魚鱗冊〉的格式不同，而與上引黃岡縣零殘湖河泊所的〈洪武赤曆甲冊〉的格式大致相同。其卷首稱：

湖北武昌府蒲圻縣民公議合全約人楊俊卿、鄧李畢、聶何龍、吳任毛、張陳何、姚王李、湯曾徐、王欽宋、何湯甫等祖，充江夏縣金口墻業甲，額

總課米壹千三百石有零。加（「嘉」之誤）靖四年，編立壹拾捌總。至萬曆十七年，人戶陸續逃絕，錢糧拋累，官民比併，任官黃河泊票拘通總業民到所公議合約，開除絕亡，實在課米五百四十石有零，比例改編一十二總，至今無異。內有楊俊卿項下朋戶李祥甫近時逃亡，累及俊卿，於廿七年八月內有卿具告本縣王太爺，蒙准行拘各業甲中證到官審理，斷令仍將原米五百四十石有零賞押外，議寫分關，造冊一本，請印存圖，以後一十二總永遠遵守，每年四名輪流，照舊應役。

則知楊俊卿等之祖本為蒲圻縣民，「聞充」江夏縣金口壩河泊所所屬「業甲」；嘉靖四年（1525）編立為十八總及萬曆十七年（1589）編改為十二總，僅為輪流應役之制，而「業甲」之編排則當在此前就已存在。此件〈金東西水稞全冊〉及上引〈金東西水魚鱗冊〉均攢造於萬曆年間，然其中關於「業甲」之記載當反映出明前中期制度的部分真相。而據此兩件文書，知若干「業甲」（在萬曆十七年編改後的制度中，是三個業甲）又編為一「總」。此種合若干業甲為一總的編制，不見於黃岡縣零殘湖河泊所的赤曆甲冊。然上引王光裕〈七所魚課說〉提及「逐年業總，不過一二人」；萬曆間潛江知縣朱熙洽在〈請清漁糧詳文〉中說：「據各業總開造舊額、新買人戶姓名、糧石數目及坐落地名冊籍。」<sup>34</sup> 其所謂「業總」，當即「業甲之總」，亦即金口壩河泊所西水業甲所編之「總」。若所說不誤，則河泊所漁戶之編排在「業甲」之上，又有「總」的編制，形成為「總一甲」二級。然上引〈金東西水稞全冊〉又將西水十二業甲稱為「十二總」（據此推測，所謂嘉靖年間的十八總，也當是指十八個業甲），似乎「甲」即同於「總」，蓋「甲」仍為漁戶編排之基本單位，而「總」只在輪役方面才發揮作用。

綜合上述材料，大致可以認知：明前期，湖廣地區諸河泊所對所轄河湖水域與漁戶曾攢造〈水魚鱗冊〉與〈甲冊〉，並將漁戶編排為「業甲」。「業甲」各領業戶若干（一甲初編時有十五戶），以全「甲」為單位或以「業戶」身分開領湖池水域、承辦諸色魚課；然後再由各甲所屬之「業戶」共同使用所領湖池水域，分擔課米。黃岡《劉氏宗譜》卷首〈業甲序〉云：「業甲者，業漁以供國賦也。甲有八，我居其一。八家同業，是業私以營生，公以裕國。」<sup>35</sup> 然則，「業甲」的首要涵義在於「同業」，即若干戶共同擁有同一份「產業」（湖池水域），是以「業」

<sup>34</sup> 康熙《潛江縣志》卷三，〈輿地志〉，「鄉區」，〈又請清漁糧詳文〉，頁48。

<sup>35</sup> 黃岡《劉氏宗譜》（民國三十五年黎照堂刊本，武漢大學圖書館藏），卷首，〈業甲序〉。



(「湖業」)為基礎編成的「甲」;被稱為「業甲」的戶不過是同業諸戶的代表,同時也是承辦諸種魚課的「戶名」(當然,由於實行輪役,代表本甲應役的業戶都可能稱為「業甲」,所以,每個業戶都可能輪作「業甲」)。因此,黃岡縣零殘湖河泊所所謂「洪武年間赤曆編定甲冊」的「甲冊」,實為「業甲之冊」,即記載以「業」為基礎編成的「甲」的簿冊。它應當是河泊所「赤曆」的核心部分,或者王光裕所說的「赤曆」就是這種「甲冊」。它與萬曆二十七年〈金東西水稞全冊〉均以「業甲」領湖業,以「業戶」繫於「業甲」與湖業之下,與黃冊里甲編排之原則大致相同。萬曆十七年〈金東西水魚鱗冊〉則以湖業為綱,各繫以業甲、業戶若干,與田土魚鱗冊的編製原則大致相同。由於今見文書實為後世抄本,已無以窺知其本來面目,然藉此仍可得知:河泊所控制河湖水域與漁戶的基本方式,當是以業甲閘辦湖業、承納課役,並由業戶輪流應役,而將業戶組織編排起來的基礎,乃是同一「甲」的漁戶擁有「共業」。蓋河湖水域不便如田地那樣分割成小塊、各歸田戶,只能由若干漁戶共同擁有一片水域,從事漁業生產,遂成為同甲業戶之「同業」;<sup>36</sup>而官府既側重於徵科諸色魚課(包括解送之役),故「同業」各戶合立為一「甲」,輪流承辦魚課。

河泊所攢造的「甲冊」既然以業甲領辦湖業為基礎,則與以人戶為基礎的黃冊里甲,在編排原則上並無根本性差別。然則,這些編入赤曆冊、由河泊所領管的業甲、業戶是否同時也會編入州縣黃冊里甲系統?如上所述,洪武初年,黃岡縣的漁戶梅琅是編入里甲系統的,洪武、永樂、宣德年間漢陽縣閘辦湖業的軍戶也當屬於里甲系統。然上引李遵供狀稱李遵為「黃州府黃岡縣廣安鄉零殘湖河泊所業甲」,而未言明其所屬里甲。這固然可理解為意在強調李遵在本案中的身分乃是「業甲」,也可理解為河泊所業甲(及業戶)並未納入州縣里甲系統。在此件供狀之前,有節單列的文字(並非供狀之組成部分,可能來自河泊所的榜文),稱:「大小業戶有奸頑霸占,許赴所呈告,以憑申究。」說明涉及業戶領管水域、承辦魚課等糾紛問題,當由河泊所負責處理。嘉靖四年(1525),封國在常德府的榮王奏討沅江河泊所魚課作為王府「管業」,嘉靖帝允准,並「敕諭沅江河泊地方軍民

<sup>36</sup> 當然,在後來的演變過程中,業甲所屬的湖業(特別是湖池已淤為洲灘、甚至圍墾為田地後)逐步析為若干塊,分由各業戶佔有,而同甲業戶仍共有一塊湖業。如據黃岡《劉氏宗譜》卷首〈業甲序〉記載,劉氏所屬之「業甲」由八個業戶組成,共有濟泥湖、輪車河兩處湖業,「八家輪流管紹」,為「八甲之公所也」;而三店上之圩渠墻、赤土坡之鐵桿稱等處,則是「我甲之私管紹業」,亦即劉氏一戶所管之湖業。顯然,同甲共業,到後來演化為各戶分佔湖業、然仍保留一片共業的形態。

人等」，令沅江河泊所「所屬其團坪等場村湖二十七處及腹內所載子湖並西南二江潭長河口岸繒網湖頭、業甲人等，俱著本府自行徵收。」<sup>37</sup> 則在歸屬榮王府管業之前，凡此村湖及江河口岸的「繒網湖頭、業甲」均歸沅江河泊所管轄。嘉靖《漢陽府志》卷五〈食貨志〉記永樂十年府、縣黃冊戶，列為「軍民匠等」；嘉靖十一年、二十一年黃冊戶，除軍、民外，詳列「雜役力士校廚鼓手水夫馬站匠鋪僧道文等」，並未及於漁戶。在賦稅類中，亦將「魚課」（「湖課」）單獨列出，獨立於黃冊里甲戶所納稅、絲、糧、額辦及稅課局「額辦商稅」之外。嘉靖《沔陽志》卷九〈食貨志〉記洪武二十四年沔陽州、景陵縣合計雜役戶共有八百五十七戶，其時二州縣共有三十一處河泊所，這些「雜役戶」當不會包括河泊所領管之漁戶。直到清初順治年間沔陽州編審人丁，曾將「漁田人戶」編入「加增人丁」，「附載糧里」，而府、司批為不合，令將「漁丁各歸各所」。<sup>38</sup> 凡此，似都指向明代沔陽州漁戶的籍屬納課應役，與黃冊里甲戶的籍屬田糧應役一直分屬不同的系統。黃岡《松湖陳氏宗譜》首卷〈夏部·凡例〉載：「本族里長名陳得。樟松湖大業甲名陳什一、什二、什三，明萬曆中回糧里。湖課繁冗，通計戶口，釐為一分、二分、三分均當，房分未免參錯。今圖依二世祖列為孟、仲、季三房，糧里湖課，悉遵舊例。」<sup>39</sup> 陳什一、什二、什三本為樟松湖河泊所管領的業甲之名（戶名），萬曆間「回」入「糧里」，說明他們本來屬於「糧里」（黃冊里甲），「闖入」河泊所之後即不再屬於「糧里」。這也從側面說明河泊所業戶不屬於黃冊里甲系統。

上引嘉靖中李遵供狀中提及洪武間零殘湖河泊所共闖入二百二十一業戶。南直隸池州府明初設有八處河泊所，原額二千一百零三戶，平均每所有二百六十三戶；<sup>40</sup> 江西九江府湖口縣逆沙夾河泊所明初洪武間額定漁戶一百八十四戶。<sup>41</sup> 若以每河泊所領有漁戶二百戶計，明初漢陽、漢川、沔陽、景陵四州縣境內置有四

<sup>37</sup> 《嘉靖事例》（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第51冊，據鈔本影印），〈議駁榮府魚課〉，頁183。

<sup>38</sup> 光緒《沔陽州志》（《中國地方志集成·湖北府縣志輯》第47冊，據光緒二十年刻本影印），卷四，〈食貨志〉，「戶口」，頁130-131。

<sup>39</sup> 黃岡《松湖陳氏宗譜》（民國十六年刻本，武漢大學圖書館藏），首卷，〈夏部·凡例〉。

<sup>40</sup> 《明英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4），卷七四，正統五年十二月甲午，頁1466。

<sup>41</sup> 嘉慶《湖口縣志》（嘉慶二十三年刻本，武漢大學圖書館藏），卷五，〈食貨志〉，「漁課」條，頁7。

十一處河泊所，當有漁戶八千餘戶；而據嘉靖《漢陽府志》卷五〈食貨志〉與《沔陽志》卷九〈食貨志〉的記載，明前期四邑黃冊戶數約在一萬八千戶上下，<sup>42</sup>則漁戶約當黃冊戶數的二分之一弱。換言之，估計江漢平原諸州縣河泊所管領、編入「甲冊」的漁戶，可能佔全部著籍戶（包括州縣黃冊戶與河泊所「甲冊」所載的業戶）的三分之一左右。

需要說明的是：編入河泊所「甲冊」或「水魚鱗冊」的業戶，未必就是實際的漁戶。在〈萬曆十七年金東西水魚鱗冊〉中，見有鄧李畢、楊萬喬、楊李王等業戶之名，且有兩個或三個人名共有一個戶名者（如「一戶：吳有望、張天信」；「一戶：彭恩、湯萬德、李祿」），說明這些「業戶」也僅是戶名，可能由若干漁戶共有一個戶名。這些編入河泊所「甲冊」或「水魚鱗冊」的業戶，也可能同時就是黃冊里甲戶。上引王光裕〈七所漁課說〉述及明初曾命「軍戶」開辦湖業，這些軍戶當然是黃冊里甲戶，但當他開辦湖業、承辦魚課時，也可編入河泊所的「甲冊」以納課應役。這樣，開辦湖業的軍戶即當具有雙重身分。永州府被強迫「開湖蕩」的「編氓」，可能也是如此。在這種情況下，河泊所「甲冊」中的業戶與黃冊里甲戶之間可能有諸多交叉模糊之處，從而為里甲戶「變身」為漁戶提供了可能（見下文）。當然，凡此被「開」入河泊所的業戶，並非皆以漁為業，此點為所周知，無須贅論。

### 三・明代江漢平原大部分新墾垵田及垵民未入或未完全納入版籍

嘉靖《沔陽志》卷八〈河防志〉記沔陽州垵田開發之進程甚悉，謂明初「江漢既平，民稍墾田修堤」，其「時法禁明白，人力齊壹，隄防堅厚，湖河深廣。又垵少地曠，水至即漫衍。」則知當時墾田修堤之「民」受「法禁」約束，是被編入黃冊里甲的；而「垵少地曠」，說明編入里甲的垵民並不多。至成化以後，圍垵不斷增加。嘉靖《沔陽志·河防志》說：

其後，佃民估客日益萃聚，閒田隙土易於購致，稍稍墾闢，歲月浸久，因攘為業。又湖田未嘗稅畝，或田連數十里而租不數斛，客民利之，多瀕河

<sup>42</sup> 以永樂十年為例：本年漢陽府黃冊戶軍民匠等共 6,340 戶（嘉靖《漢陽府志》卷五〈食貨志〉，頁 1），沔陽州為 7,475 戶，景陵縣為 3,611 戶（嘉靖《沔陽志》卷九，〈食貨志〉，頁 1-2），四邑合計為 17,426 戶。

為堤以自固，家富力強則又增修之。民田稅多徭重，丁口單寡，其堤壞者多不能復修，雖院必有長以統丁夫、主修葺，然法久弊滋，修或不以時，故土未堅實；丁夫或非其數，故工尚鹵莽。夫院益多，水益迫；客堤益高，主堤益卑，故水至不得寬緩，湍怒迅激，勢必沖齧，主堤先受其害。由是言之，客非惟侵利，且貽之害也。<sup>43</sup>

在這裡，「客」所圍墾的湖田與「主」所耕種的「民田」相對應：湖田不「稅畝」，即不納田賦，「或田連數十里而租不數斛」，「民田」則「稅多徭重」；民垵（主堤）丁口單寡，堤工粗率卑下；客垵（客堤）則堅固高大，且為數眾多。顯然，「客」及其「湖田」未入圖籍，即未被編入黃冊和魚鱗冊，其所納之「租」，當即魚課（湖課）。同書卷九〈食貨志〉末童承敘論云：

沔地窪澤鍾，故歲恒凶；頻歉少穰，故民恒瘠。然湖多易淤，土曠易墾，食物旋給，他方之民萃焉，而江之右為甚。彊者侵產，弱者就食，故客常浮於主。然客無定籍，而湖田又不稅畝，故有彊壯盈室而不入版圖、阡陌徧野而不出租糧者。民丁口單寡，田地汙萊，則至於鬻妻子、死桎梏而不能免也。……或謂民無兩籍，地無兩賦。客之繫，非不曰某郡縣也；湖之租，非不曰某河泊也。不知既已樹桑梓、開畊畝，尚可泥於鄉土、同於湖澤乎？況彼籍易竄，此籍易匿，湖租常少，田租常多，變移生死，規避重輕，其弊豈一日之積哉？夫無籍遊民也，無稅之閒田也，二者惟沔為多，而其增其殺、興利湔弊，非良有司莫能調停矣。<sup>44</sup>

據此可知：（一）沔陽州的外來移民較多，其來源以江右（江西）為最。（二）客民多未入籍，或仍繫以江右舊貫，或脫籍而成為遊民；因未入籍，故亦無徭役。（三）客民圍墾的湖田（垵田）多不稅畝，即不納田賦；偶有徵科，亦止納「湖租」，歸入河泊所系統，而實際上這些進入湖區的客民「樹桑梓、開畊畝」，即已圍墾垵田，並非居於湖澤之上的漁戶。

這種情形，在明中後期的江漢平原諸州縣，均相當普遍。萬曆《承天府志》卷六〈風俗〉謂承天府各縣「佃戶多流徙，輕棄其業，桀黠好訟，欺凌主戶；而豪貴之家，弱肉強食，法所不逮。地多異省之民，而江右為最，□游工作者，賃田以耕，僦屋以居，歲久漸成土著。小民恒以賦役煩重，為之稱貸，倍息而償之，質以田宅，久即為其所有，以故公逋日多，而民亦日貧。」其鍾祥縣「頻年

<sup>43</sup> 嘉靖《沔陽志》卷八，〈河防志〉，頁3。

<sup>44</sup> 嘉靖《沔陽志》卷九，〈食貨志〉，頁17-18。

民困徵輸，習俗狡偽，避徭畏罪之徒，爭投皇莊之佃，動梗約束；小民復產去糧存，土戶凌于客戶」；潛江縣「田多者皆流寓豪恣之民，土著反為佃僕；奸民享淤田之利，而愚樸貧弱者有賦役不均之歎。蓋王府之占田、軍□屯地錯處其中，民之受累極困矣」；沔陽州「頃年湖多淤為膏腴，而各藩奏請為業，士夫之有力者亦從而強佔之，民無所得利，而黠者又以己業跳入其中，賦日逋而民亦日貧。」<sup>45</sup>那些擁有大量田產的豪恣之民乃是「流寓」、「奸民」，顯然多未入籍；其所有之田，也大抵多未徵科，故貧弱者才「有賦役不均之歎」；至於各藩佔田及王莊上的佃戶，更不可能納入州縣官府的徵科範圍。康熙《潛江縣志》卷三〈輿地志〉「鄉區」錄萬曆五年（1577）知縣朱熙洽〈請清漁糧詳文〉云：

漁糧之設，各該州縣湖池多者設河泊所，而鄰境州縣湖池少者以其課就近附於各所。本縣地界窄狹，湖池間雜，西南則遞江陵縣倚北湖河泊所，東南則遞監利縣分鹽河泊所，正東則遞沔陽州剏河河泊所，東南（「北」之誤）則遞景陵縣葫蘆三灣河泊所，歲有常課，載在赤曆。但課雖屬於各所，其地皆在本縣腹裏，強有力者據為己業，享利無窮。且自夜汊水滄之後，地名三湖一帶淤成膏腴，一望漫彌，莫知頃畝，而糧不滿數石，民心因已不平矣。且乘便置產，專務便宜，買者非輕糧不收，賣者非輕糧不售。貧民迫呼救急，則以秋糧捏作漁糧者有之；豪強肆為巧詐，則以漁糧單占民田者有之；甚至田在腹內，冒名漁田，而秋、漁二糧兩無辦理納者有之；藉以業甲包占民田、而逋戶糧差全然不辦者有之。是以田連阡陌者無担石之糧，而貧無立錫者多賠賦之苦。<sup>46</sup>

則潛江縣河湖漁戶亦皆曾攢造「赤曆」，「歲有常課」，而至萬曆初年，原先交納湖課的河湖水域實已多淤為平地，特別是三湖一帶（在今潛江市南境），已圍墾成膏腴垸田，卻仍然按舊額交納湖課，而居於其間的民眾也仍被列入漁戶，編為「業甲」。不僅如此，還有很多豪強以「業甲」為名，包佔民田，或將民田冒稱漁田（納魚課之田），從而將戶籍改作漁戶業甲，民田改作湖產。朱熙洽又述及潛江縣白龍灣有何七老沒官田一千八百餘畝，「土民」徐京告領前田，出辦魚課一百二十石；又有潛江縣民曾本洪等買有沔陽州剏河河泊所漁田，謝勤、張伏善等買有沔陽州剏河河泊所、監利縣分鹽河泊所湖池，其地都是潛江縣腹內，仍照納魚課。這些材料都說明：很多湖澤被圍墾成垸田後，仍照舊交納魚課，而未升科納賦；

<sup>45</sup> 萬曆《承天府志》卷六，〈風俗〉，「潛江縣」，頁99-101。

<sup>46</sup> 康熙《潛江縣志》卷三，〈輿地志〉，「鄉區」，〈又請清漁糧詳文〉，頁48-49。

原編為河泊所業甲的漁戶也未轉為軍民籍，編入州縣黃冊里甲，更遑論漁戶因其特殊的流動性，在編排漁戶業甲時即多虛捏隱匿了。

如所周知，自明初以來，即有大量主要來自江西地區的移民進入江漢平原地區，成為垸田圍墾的主力軍；原居於河湖水域及其周邊地區的大量漁戶，也是圍墾垸田的重要力量。但在江漢平原大規模圍墾垸田的過程中，大部分新圍墾的垸田並未升科納賦，納入田賦徵科系統；垸田開發的兩大主力軍——客民與漁戶——大部分也未隨著垸田的開墾而被編入黃冊里甲。<sup>47</sup> 換言之，大規模圍墾的垸田以及圍墾垸田的客民、漁戶，大部分均未入或未完全納入版籍。雖然大量客民不斷進入江漢平原各州縣，漁戶也相繼上岸，但官府所掌握的民戶數量卻不升反降，官府控制的田地也只有很小幅度的增加（參見表一）。對此，論者多歸因於里甲制度的破壞乃至崩潰，但很多州縣的戶口數在洪武二十四年大造黃冊之後，到永樂元年（1403）第二次大造時，即有相當幅度的下降；至永樂十年第三次大造時，下降幅度更大。里甲制度的破壞何以如此容易而且迅速？我們認為，就江漢平原諸州縣而言，問題的關鍵乃在於，黃冊里甲在編排之初，即未能包括散處平原湖區的漁戶、客民，也未全部包括他們圍墾的垸田；隨著垸田開發的不斷深入，客民、漁戶這些垸田開發的主力軍固然大部分未被納入或未完全納入版籍，原已編入里甲的土著老戶也紛紛進入湖區，加入圍墾湖垸的行列，從而脫離了其原來的里甲，所以官府控制的戶口遂越來越少。

表一：明前中期沔陽州、景陵縣著籍戶口田畝的變化

年代	沔陽州		景陵縣	
	戶數	田地（畝）	戶數	田地（畝）
洪武二十四年，1391	7,572	394,106.2	4,702	389,554.4
永樂元年，1403	-97	+37,212.5	-1,091	+3,113.9
永樂十年，1412	-217	+37,662.5	-760	+13,899.9
永樂二十年，1422	-324	+38,716.5	-576	+2,948.9
宣德七年，1432	-407	+38,716.5	-500	+11,896.1
正統七年，1442	-496	+45,127.6	-1,543	+35,817.0

<sup>47</sup> 據正文所引嘉靖《沔陽志》卷六〈提封下〉及萬曆《承天府志》卷五〈鄉市〉所記，知明中期沔陽州、潛江縣均有將附籍客民編為新增里之舉，說明也有部分客民被編入里甲，但其數甚微。

景泰三年，1452	- 640	+ 47,897.9	- 1,544	+ 14,576.4
天順六年，1462	- 651	+ 48,982.4	- 1,357	+ 33,669.2
成化八年，1472	- 587	+ 49,754.73	- 791	+ 11,297.57
弘治十五年，1502	- 1,389	+ 51,023.315	缺	缺
正德七年，1512	- 829	+ 51,118.815	- 790	+ 11,297.57
嘉靖元年，1522	- 520	+ 51,132.775	- 496	+ 13,268.1

資料來源：嘉靖《沔陽志》卷九，〈食貨志〉，頁 1-7。

說明：表中「永樂元年」以下各欄戶數、田地數均是與洪武二十四年數的差額。

族譜材料為我們提供了客民移居江漢平原數代之後，仍未納入版籍的實際例證。沔陽《劉氏宗譜》卷六四〈恆產志〉載：

昔我祖之始來此土也，當明季開創之初。漢沔間陳氏亂後，人民鮮少，沔陽之北（「南」之誤）境有大湖，東南際江，北距漢陽，我祖自西江（「江西」之誤）來泛此湖，愛其水清魚美，領其地於官，標竿以為界，周回數十里，擇其地勢少高者而宅焉，今王家溝是也。天順朝始附籍納稅，乃招集漁戶而收其稞以自給。……萬曆末年，始建圩田之議。圩田者，圍湖為田，與水爭地。圩田成而吾宗日以貧，產日以鬻，以至於今，而子姓之貧無撮土者，十蓋五六也。考初建圩田時，新勝院最先，蘆白、蘆花次之，常熟、硬塢次之，大有院次之，樂耕院最後。新勝院田約八千餘畝，堤約千丈；蘆白、蘆花兩院田約三千畝，堤約六百餘丈；大有院田約千餘畝，堤約五百餘丈；樂耕院田約萬畝，堤約三千餘丈。<sup>48</sup>

沔陽劉氏於明初自江西遷居沔陽，居於湖側王家溝，「標竿以為界，周回數十里」，顯然是指湖澤，故族譜所稱「領其地於官」，實際上當是包佔湖澤。至天順間（1457-1464）始「附籍納稅」，「招集漁戶而收其稞」，是劉氏以包收魚課形式開辦湖業，其所附之「籍」當係河泊所領管之「業甲」。至萬曆以後，劉氏漸次築起新勝、蘆白、蘆花、常熟、硬塢、大有、樂耕等垸（在今仙桃市東南境），擁有垸田二萬餘畝，然所納大抵仍為魚課，並未真正入籍納賦。顯然，劉氏利用了河泊所「業甲」開辦湖池、承納魚課的制度規定，以漁戶「業甲」的身分佔據大面積湖澤水域及其周邊，然後加以圍墾，逐步發展成為「阡陌徧野而不出租糧者」

<sup>48</sup> 沔陽《劉氏宗譜》（民國三十七年續修本，湖北省仙桃市檔案館藏），卷六四，〈恆產志〉。

（劉氏蓋僅出少量「湖租」）。

漢川縣南湖林氏的「發家之路」與沔陽劉氏大致相同而稍為曲折。民國《漢川南湖林氏宗譜》卷一七〈雜編下〉載：

元末兵戈四起，川沔一帶煙火寂然。明洪武間，土曠賦懸，聽客戶插草立界，孫曾世守，軍民兩差並徵，是稱「閘業」。名額不一，則或承充世職，或備具戰守，或輸挽漕糧，或調赴邊塞應伍。……吾祖避家難，承管閘業居此，別以在官軍人尹章在衛頂伍，置南湖膳田八石、柴山一段供應差務。萬曆年，軍人應隆等自衛陸續回籍，索取軍裝，又照分重派，給軍人在衛買田、制裝，以省往返。崇禎五年，付軍人外甥龔成代解。自後，中原多事，戍差除免，惟運軍轉漕如故，其民差則以里甲別之。吾族開辦湖河，坐落稅務口，各處地界寬廣，初當網課米稅，隸沉下湖河北（「泊」之誤）項下，朋附雞鳴里六甲尹姓完糧。<sup>49</sup>

明初嘗允許（「聽」）客戶「閘業」，「插草立界」之事，不見於官書記載，應屬於民間的述說方式。林氏始遷祖所「閘」之業，本屬湖河，隸沉下湖河泊所下交納魚糧（湖課），是河泊所管領的「業戶」。但他又以「在官軍人尹章」的名義「在衛頂伍，置南湖膳田八石、柴山一段供應差務。」尹章蓋即下文所謂「雞鳴里六甲尹姓」的戶名，應屬於軍戶。則其時林氏蓋以「尹章」戶名應承軍差，復作為河泊所「業戶」開辦湖業，而「地界寬廣」的湖業方為其「發家」之基。林氏兼有兩種身分，既以「尹章」戶名納賦當差，獲取編戶權利；又以河泊所開辦湖業名義，佔據大量湖產，並圍墾成垸田。萬曆三十一年（1603），勘明南湖垸內田地約有三萬七千餘畝，林氏據有其中的大部分。<sup>50</sup> 可以想見，在此之前，相當部分已開墾的垸田仍以湖產的名義交納魚課，並未與民田一體納賦。

沔陽劉氏與漢川南湖林氏巧妙地利用河泊所「業戶」系統與州縣里甲戶籍屬納賦應役系統相對分離的「制度性空隙」，最大程度地獲取自己的權利與利益，「彊壯盈室而不入版圖」或僅有部分納入「版圖」、「阡陌徧野而不出租糧」或少出租糧，應是明代江漢平原諸州縣司空見慣的普遍狀況。更有甚者，豪勢之家利用以「甲」為單位「開辦」湖業以致河湖水域所有權不明的機會，巧取豪奪，將大片河湖水域據為己有。上引王光裕〈七所魚課說〉述漢陽縣七河泊所「匯造赤

<sup>49</sup> 《漢川南湖林氏宗譜》（民國四年刊七修本，漢川縣田二河鎮白果村林醜才先生家藏），卷一七，〈雜編下〉，頁9-10。

<sup>50</sup> 同治《漢川縣志》卷九，〈堤防志〉，「南湖垸」，頁228-229。



曆，永為遵守」之後，續云：

不期時異事殊，法久弊生。除各子湖濠埠約帖頂補、業有定主、課有定額者不敢混淆外，其餘水面，雖載在赤曆，而人無定主，其鄰近土豪，奸刁可攝小民，機變可亂成法，小民一墮計中，惟言是聽，由是數十里河水悉歸兼併之家。又賄囑吏胥，將原載數百石課米捏作「無徵」。<sup>51</sup>

顯然，由於河湖水域的產權不屬於單個漁戶，而為一「甲」所共有，故易為豪勢之家所兼併。而豪勢之家據有這些河湖水域後，更得利用其雄厚財力人力，開展大規模圍墾，而所墾之田，自不列入徵科範疇。

在明中後期的江漢平原諸州縣，強佔河湖水域最「強有力」的奸豪乃是王府及其代理人。明中後期，興王、荊王、岐王、景王等王府通過受賜、奏討、納獻、奪買、侵佔等途徑，佔據了大面積的田地，其中相當部分就是所謂「近湖淤地」、「湖陂柴洲」。<sup>52</sup> 嘉靖《興都志》卷八〈典制·禮儀〉「莊田」項下記載，嘉靖前期，興王府（王府在安陸府）共有莊田八千四百餘頃，其中原屬赤馬野豬湖河泊所的「收租田地」約九百五十七頃，原屬蘆汴湖河泊所的「收租田地」一千一百五十七頃餘。<sup>53</sup> 二河泊所管領河湖區域已墾為「收租田地」者即高達二千餘頃，在未入興王府莊田之前，均納魚課。漢川縣沉湖、安漢二河泊所，原徵魚課五百金，嘉靖中為景藩（王府在德安府）指為「淤灘」割佔，共有田地湖洲二千五百八十五頃三十三畝。萬曆《漢陽府志》卷六〈藝文志〉錄邑人蕭良有〈漢川安邑侯惠政碑記〉云：「潞藩之國，奏請景藩故業，其中貴更藉倚淤洲，波及糧地，割邑之紅糧田歸諸藩府，名曰王田。有司莫能抗，而勢不得不以所未歸諸府者補償稅額正數。」<sup>54</sup> 是王府所割佔者，不僅是河泊所管領的河湖淤洲，還包括部分民賦田（紅糧田），本來承納「紅糧」的編戶自也被割為「莊客」。

原屬河泊所管領的湖池淤洲割給或「投獻」為王府「管業」之後，原有魚課與承納魚課之「業戶」遂脫離官府掌握。乾隆《漢陽府志》卷一二〈地輿·形勢〉錄嘉靖二十五年立石之〈漢口北課舊碑記〉（「北課」當為「泊課」之譌稱）載：

<sup>51</sup> 萬曆《漢陽府志》卷五，〈食貨〉，附王光裕，〈七所魚課說〉，頁109。

<sup>52</sup> 參閱殷崇浩，〈方志所見鄂境明代王莊及其危害〉，《中國經濟史研究》1988.3：39-48；張建民，《湖北通史》，頁78-92。

<sup>53</sup> 嘉靖《興都志》（嘉靖十年刻本，國家圖書館藏縮微膠捲），卷八，〈典制·禮儀〉，「莊田」。

<sup>54</sup> 萬曆《漢陽府志》卷六，〈藝文志〉，蕭良有，〈漢川安邑侯惠政碑記〉，頁285-286。

漢口基地，先該撫按衙門會議，查係江夏縣民蕭廷機始祖承佃漢陽縣三淪河泊所十八墻、蟻子馬場湖南側地土，西至郭師口，東至大江。天順年間，民人張添爵等父祖在彼築基蓋房，每年認蕭一（「二」之誤）課銀三分。成化年間，被武昌護衛軍孫廣、刑璉投獻江夏王府，每年上岸基地一間收鵝二隻，下岸一間收雞一隻。比時民因徵（「微」之誤）租，不會告爭。弘治十年，又要加徵課銀，各民不肯認納，孫廣、刑璉轉投獻楚府，每年上岸一間徵銀三錢六分，下岸一間徵銀一錢八分。各民懼府勢力，不能抗違。嘉靖四年，該府差已處決承〔差〕張慶等丈量出上岸張添爵等六百三十戶，共房基一千零三十五間，每間每季該銀九分，共該銀九十二兩一錢五分；下岸徐文高等六百五十一戶，共計地一千零九十一間，每間每季該銀四分五釐，共該銀四十九兩零九分五釐；李勤等七十三戶新築基地二百八十一間，每間每季徵銀六分，共銀一十六兩八錢六分；丁泰等二十戶偏僻地八十間，每間每年徵銀一錢，共銀八兩二錢；王彥、李仕英二十一戶，開墾園地一十一段，每年收銀三兩五錢八分。通共每年該銀六百四十七兩。<sup>55</sup>

該志下錄順治十八年湖北巡撫與漢陽知府合署之榜文稱：「查漢口業甲蕭廷機原係武昌府江夏縣籍，先朝承本縣三淪所湖課錢糧，管收基地湖業等項」；上引〈碑記〉又謂：「前項基地天順年間民居始蓋房屋，洪武年間無由撥給」，則蕭廷機之祖當在洪武間既已開辦漢陽縣三淪河泊所湖池，成為河泊所「業甲」。天順年間漢口初興，居民即向蕭氏納租。成化間漢口地方被「投獻」給江夏王府後，即由王府徵收地租。至嘉靖四年，據張慶等丈量清查，漢口地方已有民戶一千三百九十五戶，建有房屋近二千五百間，開墾園地十一段，而凡此土地戶口均不屬漢陽府漢陽縣或武昌府江夏縣掌握，逕由楚王府派人丈量清查、徵收租銀。

然而，當承辦湖業的「業戶」兼具里甲戶身分時，情況就要複雜得多。上引《漢川南湖林氏宗譜》卷一七〈雜編下〉續云：

嘉靖三十六年，由官派設戶長，督理房長什役，通族丁糧派算均一。除戌差照舊外，什役加增，津貼本戶，幫貼甲戶，幫銀酌給。開徵期近，房長傳知，上門三次；開完，指名呈送。若奉府縣拘喚，什役引赴該戶，勒令

<sup>55</sup> 乾隆《漢陽府志》（乾隆十二年刻本；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湖北府縣志輯》第1冊，據鈔本影印），卷一二，〈地輿·形勢〉，「漢陽縣城郭坊鎮」，〈漢鎮形勢說〉，頁129-130。

到官。其民壯、月夫、水夫、馬船，通甲輪應，乾驛交卸。景府事件，亦係通甲分焉。旋復撥充潞膳，瑞監需索更甚。<sup>56</sup>

所謂「通甲」，當指「雞鳴里六甲」全體民戶；「景府事件」與「潞膳」，皆當指祇應王府租課差役。蓋雞鳴里六甲本來「通甲輪應」里甲戶應充之民壯、月夫、水夫、馬船諸役，後因使用「尹章」戶名的林氏同時承辦湖課，故沉下湖河泊所割給景府管業之後，復由「通甲」分擔「景府事件」與「潞膳」。而雞鳴里六甲「通甲」民戶之所以願意分擔本由林氏承辦的湖課，蓋其時六甲全體民戶已隨林氏一起，撥屬景王府王莊（後又歸潞王府）。換言之，本屬里甲戶的雞鳴里六甲民戶，在這一過程中「變身」為王莊的「莊客」，脫離了漢川縣的里甲戶籍系統。

當沉下、安漢二河泊所管領的河洲灘被割給景府管業之後，二河泊所即自行廢置。按照規定，河泊所廢置後，漁戶當發回有司當差。<sup>57</sup> 但由上引嘉靖四年諭令沅江河泊所所屬「繒網湖頭、業甲人等，俱著本府自行徵收」及上述漢陽縣三淪湖河泊所、漢川縣沉下湖河泊所之例觀之，其原管漁戶「業甲」並未發回給有司，更未編入州縣里甲系統，而是淪為王府的「私屬」、「莊客」。研究表明，明中期以後，特別是正德、嘉靖間，江漢平原諸州縣乃至湖廣地區的河泊所漸次裁廢，至萬曆年間幾已裁革殆盡。<sup>58</sup> 在這一過程中，原本屬於河泊所管領、編組為「業甲」的漁戶，可能有相當部分脫離了原有的河泊所「業甲」系統，或者淪為王府「莊客」，或者成為豪強的佃戶。當然，也有相當部分改由州縣「帶管」魚課徵納事宜，其漁戶則或被編入里甲冊中（往往附於里甲冊尾），<sup>59</sup> 或仍保持其漁戶

<sup>56</sup> 《漢川南湖林氏宗譜》卷一七，〈雜編下〉，頁 10-11。

<sup>57</sup> 萬曆《明會典》（北京：中華書局據一九三六年商務印書館萬有文庫排印本影印，1989），卷三六，〈課程五·魚課〉，頁 258, 265。

<sup>58</sup> 尹玲玲，《明清長江中下游漁業經濟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04），頁 303-306, 389-400；徐斌，〈明代河泊所的變遷與漁戶管理〉，頁 84-88。

<sup>59</sup> 同治《公安縣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湖北府縣志輯》第 48 冊，據同治十三年刻本影印），卷三，〈民政志·田賦〉，錄康熙三年荊州府頒〈糊糧徵正免雜榜示〉稱：「本府確查湖糧名色，果有湖糧冊籍，應附各里甲之後，徵正免雜」，並規定「速將生員鄒昂、毛翔雲等湖糧一概編入各里九十甲之尾，徵正免雜。仍嚴諭通縣里書速行遵照。」其下錄《舊志》按語稱：「公邑地處窪下，上田之外，則有湖河蕩港，舊有河泊所官徵納魚租，原無秋糧。今常、岳等府湖水止納魚稅，蓋猶仍舊制耳。獨公邑以明末裁河泊所，附縣徵收，遂濫派秋糧，然猶附諸里甲之尾，名曰尾糧，止徵條餉、南槽，不科經總徭役，仍與田糧有別也。國初仍然。迨順治十四年，經承柰籍，將湖糧混入田糧冊內，正供雜徭，概責均當。是以數年中，邑民凡有湖糧，無不破家者。」（頁 75）然則，在河泊所廢罷之後，魚課湖糧即由州縣代徵，附於里甲之尾，而承納湖糧的生員鄒昂、毛翔雲等

身分，而未散入一般民戶的里甲系統。<sup>60</sup> 至於如上引黃岡《松湖陳氏宗譜》所見那樣，「回」入「糧里」、成為正式里甲戶者或並不多見，且必有其不得不然之故。

#### 四・明後期的清田與垸田徵科

大量已開發的垸田及居於其上的垸民溢出於官府的控制、以各種名目不納或少納賦役的現象，在明中期即已逐漸突顯出來，上引嘉靖《沔陽志・食貨志》末「史氏曰」即是明證。自成化至嘉靖間，沔陽州與景陵縣均可能採取了一些措施，試圖控制更多的戶口、田地。表一中，沔陽、景陵二邑正德七年（1512）、嘉靖元年（1522）兩個大造之年的冊載戶數、田畝數均較弘治十五年（1502）有程度不同的增加，很可能就是這種努力的結果。沔陽州的新增里或亦編於此時。潛江縣在成化二年（1466）因流逋附籍增編五里，<sup>61</sup> 均當是官府試圖掌控新闢田地、戶口的表現。至萬曆五年（1577），潛江知縣朱熙洽更主持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清田。康熙《潛江縣志》卷三〈輿地志・鄉區〉錄朱熙洽〈清田記〉云：

楚故多水患，而潛于楚，撮土也。襄漢會流，決口數四，已而渾沙漸積，湮沒界址，民惟視強弱芑治，而田額紊矣。且漁湖徙入民田，漁樵輕，富者利糧之輕，非漁田不收；而鬻者亟於求收，則以糧田假漁田以售，即存糧不顧也。是以有田者無糧，糧多者畹田，而糧額又紊矣。又有王府太府官莊之田，顯、承等衛籽粒之田，互邑之中，十居三四。<sup>62</sup>

袁國臣〈清田記〉也說：

邑當漢下流，自嘉靖以來，漢水數漲，漲則田沒而民徙，田沒則經界淆，民徙則故業失，猾里豪右往往乘此蠶食之。漁田、屯田與民田犬牙錯，而民田之稅較漁、屯所輸不啻十之七八。小民欲紓目前之急，率影射以售，

---

顯已具里甲戶之身分。

<sup>60</sup> 黃岡地區行政公署水產局編，《黃岡地區水產志》（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2）錄有民國十四年編成的〈八十戶註冊〉與〈三修印冊條例〉二種，後者登載各漁戶管理的水域範圍及應納魚課數額等內容（頁108），與上文所述之明代河泊所「赤曆甲冊」格式大致相同，說明黃岡地區至少有部分漁戶，直到民國時期，仍然保持其特殊身分，並未散入一般民戶登記與納賦應役系統。

<sup>61</sup> 萬曆《承天府志》卷五，〈鄉市〉，「潛江縣」，頁97。

<sup>62</sup> 康熙《潛江縣志》卷三，〈輿地志・鄉區〉，朱熙洽，〈清田記〉，頁47-48。

以故阡陌其田者無升合之稅，稅至數十石者地鮮立堆，弊也久矣。<sup>63</sup>

所以，此次清田的重點乃是清理漁田，即將假冒「漁田」、交納漁糧的田地重新歸入「民田」，按民田科則納糧；至於潛江境內的王府莊田、衛軍屯田，則「因其舊勿籍制也」。其具體做法是「家各為丈，丈畢則受成於里；里各為丈，丈畢則受成於公正。」顯然，此次清田仍然依靠基本已成具文的里甲體系，其目的也在恢復戶口、田畝之舊額，使「里各有戶，戶各有籍」。同時，「照田均糧」，更粟地、漁田、民田三等為一則，「不分等則，一例起科」。<sup>64</sup> 這樣，實際上是取消了「漁田」的特殊性，從而使新墾垵田不能再以「漁田」為藉口不納田賦。換言之，此前假「漁田」之名的部分垵田，可能通過這次清丈，被納入官府直接控制之下，並在「不分等則，一例起科」的原則下，歸入「民田」之列。在此後潛江縣的田畝統計中，即不再有「漁田」一目，就是證明。

潛江縣的清田在萬曆八年十一月明政府下令全國清丈田畝之前，很可能是全國性清田運動的試驗或先聲。萬曆九年至十年間，江漢平原各州縣都奉命開展了清丈田畝的行動。萬曆《承天府志》卷六〈田賦〉下載有承天府各州縣「清丈過田地」與「今新開墾田地」數，其中新開墾田地數多迄於萬曆二十八或二十九年，則其所記「清丈過田地」數必在此前。其中潛江縣「清丈過田地」為 205,595.6 畝（稅畝），與萬曆五年朱熙洽所清丈的 1,102,270.3 畝（實畝）按 5.36148 畝折算 1 大畝（稅畝）後相差無幾（差 5 畝），應即指萬曆五年的清丈數；沔陽州「原清丈過田地山塘」約為 20,830 頃，與光緒《沔陽州志》卷四〈食貨志·田賦〉所記萬曆九年清丈所得「田地山塘水鄉湖墻」數完全相同，說明萬曆《承天府志》所記沔陽州「原清丈過田地山塘」頃畝數即萬曆九年的清丈數。<sup>65</sup> 康熙《景陵縣志》卷八〈田賦志〉「田地」條下稱：「萬曆九年辛巳，奉例丈量，田地山塘上中下四則共計一萬八千一百四十四頃二十五畝四分。萬曆十年壬午，撥出漁田上中下四則共四千六百一十一頃八十畝四分九釐，實存民田上中下四則共一萬三千五百二十二頃四十四畝九分一釐。」<sup>66</sup> 通過這些清田活動，官府控制的戶口與田畝數均有所增加。萬曆《承天府志》卷六〈民數〉記潛江縣「舊管軍民雜役人戶」為 4,103 戶，據康熙《潛江縣志》卷九〈賦役志·戶口〉所

<sup>63</sup> 萬曆《承天府志》卷一四，〈藝文〉，頁 270。

<sup>64</sup> 康熙《潛江縣志》卷三，〈輿地志·鄉區〉，劉垓，〈清田記〉，頁 52-53。

<sup>65</sup> 萬曆《承天府志》卷六，〈田賦〉，頁 102-107。

<sup>66</sup> 康熙《景陵縣志》卷八，〈田賦志〉，頁 4-5。

記，這一戶數為朱熙治清田後的萬曆七年數；「今屆新人戶」5,547 戶（當是萬曆二十八或二十九年數），二十年間增加了 1,447 戶。沔陽州與景陵縣的戶口、田畝，較之嘉靖《沔陽志》所記嘉靖元年的戶口、田畝，也都有所增加，特別是田畝數，增加了四倍餘（見表二）。著籍戶口數的穩步增加，與嘉靖以前的持續遞減，形成鮮明對比；而田畝數的大幅增加，更說明官府對圍墾垸田的控制大大加強了。

表二：嘉靖、萬曆間沔陽州、景陵縣著籍戶口、田畝數的增加

年代	沔陽州		景陵縣	
	戶數	田地（畝）	戶數	田地（畝）
嘉靖元年	7,052	445,238.975	4,206	402,822.5
萬曆九、十年	8,698	2,083,007.773	缺	1,814,425.4
萬曆二十年	8,779	2,083,007.7	5,696	1,814,425.4
萬曆二十八、二十九年	9,333	2,084,307.7	5,935	1,815,220.8
萬曆四十年	9,729	缺	缺	缺

資料來源：嘉靖《沔陽志》卷九〈食貨志〉；萬曆《承天府志》卷六〈民數〉、〈田賦〉；康熙《景陵縣志》卷八〈田賦志〉；光緒《沔陽州志》卷四〈食貨志·戶口〉。

因此，正是在自嘉靖至萬曆間官府不斷通過清田、新編附籍里甲等手段，努力控制新墾垸田及在其上耕作的垸民的過程中，部分新墾垸田和垸民被納入官府控制之下，成為徵科田畝和編戶齊民。上引民國《漢川南湖林氏宗譜》卷一七〈雜編下〉稱：「萬曆四十一年，從化公以朋黨不便，願以祖分丁糧仍留六甲公完，其餘本身丁稅、夏秋兩稅，另撥三甲，新立本姓戶籍應差。」<sup>67</sup> 蓋林氏「祖分丁糧」本在六甲「尹章」戶名下完納，「本身」應承納魚課（隨沉下湖河泊所割給景府、潞府後，承納王府租課差役）。據萬曆三十一年林若企撰〈范公南垸修堤碑記〉，知大約在萬曆二十九年前後，南湖垸田（其地多為原沉下湖河泊所管領之湖澤）又歸屬漢川縣，時任知縣范士林對垸內里甲賦役徵納曾作過部分清理調整，「徵糧其按季有單，每季清單具有成數」，「解糧則起運屬官各行，扛解盡行蠲

<sup>67</sup> 《漢川南湖林氏宗譜》卷一七，〈雜編下〉，頁 9-11。

免」。<sup>68</sup> 林氏在「祖分丁糧」之外另得有「本身丁稅、夏秋兩稅」，或即在此時。萬曆四十一年，林氏以「朋當不便」，另於三甲（也當屬雞鳴里）下「新立本姓戶籍應差」。林氏由河泊所「業戶」兼具里甲戶身分，到嘉靖三十六年加入六甲輪役，後以河泊所「業戶」帶同六甲人戶割入景府，又於萬曆二十九年前後與六甲一起回復漢陽縣里甲系統，再到萬曆四十一年新立本姓戶籍，雖然有其家族自身發展的內在需求，但顯然也與官府力圖控制更多湖區已墾田地、戶口的努力不無聯繫。嘉靖十一年（1532）漢川縣著籍戶數為 1,340 戶，萬曆三十九年（1611）大造，共有軍戶雜役戶 2,546 戶。<sup>69</sup> 顯然，自嘉靖至萬曆，漢川縣新入籍之民戶較多。上引黃岡《松湖陳氏宗譜》所記樟松湖業甲在萬曆中「回糧里」即附入里甲戶「陳得」戶名之下，情形可能亦與漢川南湖林氏相似。但是，由於推行「一條鞭法」之後，賦役之徵，併為一條，隨田均丁，計畝徵銀，「賦役一出於田」，戶籍在賦役徵納體系中的作用大為降低，<sup>70</sup> 故萬曆以後的清田，並不同時伴隨整頓里甲，更不包括檢括戶口，所以如漢川南湖林氏那樣在萬曆後期新立戶籍應差的事例相當鮮少；上引沔陽《劉氏族譜》所記之劉氏，雖已擁有二萬餘畝田產，卻迄未入籍，就是明證。

## 五・「按田歸垸」與里甲制的變質

如所周知，清初各州縣編審人丁與稅糧，仍是以里（圖）甲為基本單位的，催徵錢糧、清丈田畝，亦仍多由里排、里書負責。就江漢平原諸州縣來說，以久已破敝不堪的里甲體制為基礎編審人丁、稅糧，除通有之弊端與困難外，還有一個特殊的問題：前明王府莊田已盡改為民田（「更名田」），「一切稅糧徭役率歸劃一」。然此前這些莊田上的「莊戶」並未納入里甲系統，其催租徵科屬於另一系統：在漢川縣，原屬楚藩、潞藩莊田的更名田，仍均由「區頭」催租徵役；<sup>71</sup> 在潛江縣，「明皇莊租畝荒多熟少，明時太府徵收，租無一定，每畝或重至三四分，

<sup>68</sup> 林若企，〈范公南垸修堤碑記〉，見同治《漢川縣志》卷九，〈堤防志〉，「南湖垸」，頁 228。

<sup>69</sup> 萬曆《漢陽府志》卷五，〈食貨志〉，頁 113。

<sup>70</sup> 王毓銓，〈明朝徭役審編與土地〉，《歷史研究》1988.1：162-180；後收入《王毓銓史論集》（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708-738。

<sup>71</sup> 康熙《漢陽府志》卷一，〈輿地志〉，「里甲」。

或輕則一二釐不等。」<sup>72</sup> 至清初，既將莊田改為民田，勢必調整差別巨大的賦役徵科系統。故清初江漢平原諸州縣清田均役的重心實際上在於將更名田（包括王府莊田和部分漁田）或升科，或改則，使之與民田一致，一體納賦徵役。

順治十年（1653），知縣柯賡昌率先在潛江縣進行「均平圖賦」，以「（稅糧）四十三石為一里，徵輸用官民細戶單」，即按田糧編里甲；但其實對民田「有編審，無清丈，畝賦盈虛淆亂仍舊。」柯氏此次均平圖賦的重心乃在「比照民糧例，將官、莊田地編派里甲，革除總小甲，為四十六總，每畝一則，攤租一分四釐。」<sup>73</sup> 值得注意的是，柯氏所編的官、莊田地四十六總中，有九總位於潛江北境沔水北岸泗沱湖一帶，稱為「外九總」，原為皇莊莊田（在割入皇莊前屬設在景陵縣的葫蘆三灣河泊所管領），包括九個垵（「外九垵」），九總恰好對應九垵，說明至少有一部分「總」是以「垵」為單位編製的。

柯氏的改革實際上將潛江縣的賦役徵科分為兩個系統：原有的里甲系統與新立的四十六總系統。這種二元體制顯然不能持久。順治十六年（1659），知縣葉臣遇遂更行「甲糧法」，「糧七石五斗編提甲首一名」，遂「增置甲首三千餘人」，也是按田糧編里甲。然其法行之不善，「人民大困，其為徭役害者，自豪貲勢要，以至上下胥吏，皆避役之人，所寄坊廂冊尾冒濫，免徭之糧尤甚。愚戇鄉氓，子衿世胥，偏受毒累，一經里長，當年夫馬解運無名外派，誅求靡寧日，必至賣產破家、死且徙而後已，流禍不可勝言。」<sup>74</sup> 故至康熙四年（1665）即予革除。但問題並沒有解決。至康熙八年，知縣王又旦復主持清田平賦。康熙《潛江縣志》卷三〈輿地志·鄉區〉錄黃里〈清田記〉記其事云：

區劃疆理，檢定戶籍，土著者必核其人，逃亡者必詳其地。原隰墳衍，川澤之汙，體形惟肖，凡漏弓匿畝，改形減等，析名詭戶，撻發如響。鄉以內，量度勾股之所及，有神明式之，如公之履畝而稽也。事既竣，擇吏之能書計者若干人，局置公廨，朝晡放衙，躬自編校：以鄉規田，以田均畝，以畝定賦，里準於田，長準於賦。凡為鄉者五，為里二十有三，而更坊廂之三為畢公里，以處薦紳之在城市者。<sup>75</sup>

重新編製的里甲，以四十石為一里，每里十甲，帶轄尾二甲。顯然，王又旦編製

<sup>72</sup> 康熙《潛江縣志》卷九，〈賦役志〉，「全書」，頁167。

<sup>73</sup> 康熙《潛江縣志》卷九，〈賦役志〉，「全書」，頁167。

<sup>74</sup> 康熙《潛江縣志》卷九，〈賦役志〉，「全書」，頁168。

<sup>75</sup> 康熙《潛江縣志》卷三，〈輿地志〉，「鄉區」，頁54-55。



的里甲按田、賦編組，以田糧為中心，以人戶從田糧。「里甲」之名稱雖然仍舊，其性質卻已發生了根本變化。

新編製的里甲既以田糧為中心，而潛江縣的田畝絕大部分又在圍垸之中，這樣，垸遂成為新編里甲體系的基本單位。正因為此，至康熙二十三年（1684）禁革里排之後，「稅糧按戶隨田，田歸各垸，垸歸各鄉」，「鄉圖之名存而籍非舊矣」。<sup>76</sup> 在康熙《潛江縣志》卷三〈輿地志·鄉區〉所記潛江縣鄉里體系中，則完全未記二十三里之詳情，而逕以「垸」繫於諸鄉之下。如其於「長樂鄉垸田」目下即分記長塢一垸等共四十五處垸、洲，各垸、洲之下則詳載其徵科田畝，如長塢一垸有「民田三萬一千三百二十畝五分九釐一毫，更名惠地一百四十五畝六分八釐三毫。」<sup>77</sup> 顯然，垸已成為賦役徵科的基本地域單位。

這種按戶隨田、按田歸垸、按垸歸鄉的賦役徵科辦法，在潛江縣一直相沿使用。潛江市檔案館藏有清末至民國時期的太和鄉實徵底冊兩卷。第一卷封面左側題為「太和鄉實徵底冊，並畢」，中題「光緒拾柒年分」，旁有小字四行：「實徵。內凡做推收，或新立戶柱，從中格起，轉致下格，後至上格。如三格均滿，或挨同姓移前移後，另立戶柱，不可粘搭紙條。特記。」右側一行，作「垸湖流灘子垸，並畢廬、太平、福抵、黃中。」然則，第一卷所錄為垸湖垸流灘子垸田賦徵科的底冊。每一戶柱分為三格：首格列戶名，旁注小字注明屬紳戶抑民戶；第二格分列糧、艮（銀）、米三項，其所添注之小字或有涉及民國年間者（最晚至民國三十六年），顯係後來所添加；第三格多為添注。卷末一頁總書有「二百七十五戶」字樣。第二卷為「磚淌外垸」冊，冊封與冊頁書寫格式與第一卷基本相同，左側第一行亦直書「太和鄉實徵底冊，並畢」，中題「光緒拾柒年分」，右側直書「磚淌外垸」四字。這兩卷底冊於光緒十七年（1891）造冊，後相沿使用至民國時期。仔細研究這兩卷實徵底冊，可以斷定：直到清末民國時期，潛江縣的賦役徵科（糧、銀、米）仍是以垸為單位進行的。

清代潛江縣里甲賦役體制的演變，在江漢平原諸州縣中具有代表性。當然，各州縣的變化過程與具體方式不盡相同。在沔陽州，順治九年（1652），「糧漁歸併，清丈田畝」，蓋亦只有編審，實未清田。至康熙間，將漁田人戶附載糧里之事均未能實施（見上文），更遑論更名田併入民田、一例徵科了。乾隆《沔陽州志》卷三〈提封·鄉圖〉謂：「沔地自明迄今，區分方域，編載田賦，糧田四十三里，

<sup>76</sup> 康熙《潛江縣志》卷三，〈輿地志〉，「鄉區」，頁47。

<sup>77</sup> 康熙《潛江縣志》卷三，〈輿地志〉，「鄉區」，頁37-39。

漁田四十一所析為四十六總，又益以澧馬所、潞楚福惠四藩租，足以盡沔之疆域。無何，區圖紊亂，稅圖漏淆。」<sup>78</sup> 則沔陽州在明末清初乃按糧田、漁田分別徵科，其所分糧田四十三里、漁田四十一所（分為四十六總「業甲」，其時沔陽州境內大部分河泊所已廢罷，「漁田」當即原由河泊所管領、交納魚課但實已開墾的埧田），也當是按照田糧編組的；僅存的澧馬潭河泊所領轄湖澤和潞、楚、福、惠諸王府莊田則另有租課系統。至雍正十二年（1734），知州禹殿鼐始主持全面清丈平賦，於乾隆元年（1736）告竣，「丈出上、中、下、水鄉茭塌、白水等項共田四萬一千一百六十八頃九十一畝七分一釐四毫，內除神壇廟基、堤腳、義塚、官路、官地、學田、公溝等項五百一十五頃一十八畝四分五釐四毫不派餉米，實在五則田共四萬六百五十三頃七十三畝二分六釐，較原額增出田一萬一千五百五十一頃五十四畝三分一釐八毫三絲二忽七微。豁除糧漁及更名諸目，分為五鄉統之。」<sup>79</sup> 禹殿鼐〈清丈致同事各委官書〉，述及清田之流程，謂：「每臨一院，五日前先諭六役，傳集業戶，發給冊式，公同覈丈。號次不清者，令挨序編順之；等則不確者，令速行改正之。……凡附近之院，度其大小，或十日以前，或一月以前，先為曉諭，亦無不可。……一臨該院，按冊查號，按號查則，使號無錯亂，則無混淆，民情相安，眾口如一，則此院之田無庸過疑，即令造明提戶大總，核算無訛，以成信冊。」<sup>80</sup> 則知當時清丈田畝，是按埧進行的，每埧各造「提戶大總」一冊（即按戶分立的總冊）。不過，可能因為沔陽州疆域廣闊，並未按埧歸鄉，而是以埧歸里，復以里歸圖，以圖歸鄉，即所謂「地有鄉，冊有里，田有埧，賦有則，合糧、漁一例均攤。」劉國佐〈清丈錄〉詳記此次清田始末云：

吾沔本稱澤國，淤沈不一，滄桑屢更，有昔本上糧而今為湖野，有向稱荒塌而近成膏腴，完無田之差者所在多有，享無糧之土者不一而足。田之賴於丈、民之欲其清者，急急矣。……〔雍正〕壬子，汜水禹公簡蒞茲土，……甲寅秋，遍察輿情，繪圖請命，得邀俞允。於是分方設官，徹底澄清，公以一身總理。未及兩載，旋告成功，版圖一新。仍以沔五萬一千五百五十六兩有奇之額餉，均之通州四萬六百五十三頃七十三畝有奇之地畝。昔之分為糧、漁者，今止作上、中、下、水鄉、白水五則。……昔之糧、漁、藩租種

<sup>78</sup> 乾隆《沔陽州志》卷三，〈提封〉，「鄉圖」。

<sup>79</sup> 光緒《沔陽州志》卷四，〈食貨志〉，「賦役」，頁135。

<sup>80</sup> 光緒《沔陽州志》卷四，〈食貨志〉，「賦役」，頁146。

種名色，經百年未改者，今悉削除，蓋盛世之制度又為不可無因革損益之義也。昔糧餉之在甲者，不轉瞬而移于乙，時增時減，惟憑里書業民之意。今田坐某院，餉即隨之，初布曉單，畝數糧額並載，作閭閻傳家之寶。歲給催單，定限輪滾，示小民完納之便，杜飛詭、免冤裁、省追呼也。<sup>81</sup>

「田坐某院，餉即隨之」，即以賦隨田、按田歸院。這樣，沔陽州到乾隆初年，遂最終完成朝按田、院編里甲的轉變，較之潛江縣，晚了六七十年。在禹殿鼇所編製的五鄉二十圖一百里中，鄉、圖、里實際上只用以表示地域單位，特別是百姓納賦實行「歲給催單，自行投櫃」的辦法，「里」亦失去了催徵賦役的功能，於是「院」遂成為賦役徵科的基本單位，舉凡清丈田畝、曉單催單之派發、紅簿（實徵冊）之編製、堤防之維修，均是按「院」進行的。而在光緒《沔陽州志·食貨》「賦役」所列各里管領院目中，見有「浹字型大小一冊」、「浹字型大小二冊」（悅安鄉第三圖東三里）、「百石上院子果院五冊合總」、「百石院漁、湖二冊合總」（寶成鄉第二圖石板里）等記載，說明紅簿底冊（實徵底冊）正是按院、洲造冊的。

漢川縣的情形與沔陽州大致相仿。康熙《漢陽府志》卷一〈輿地志〉記清初漢川縣賦役徵科辦法云：

漢邑每里舊設十甲，甲各有什役，即別邑所云排年是也。什役催各納戶應完錢糧，親封投櫃，而每里各有當年一人，以督什役。自兵燹後，戶口流亡，向來什役大半消乏，於是每里僉納戶糧多者為什役，里各五人，不計各花戶細數，而總其甲之成數於什役，每月限比，照數交官，入庫起解。此亦變通舊制而得其平者也。或大兵經臨，其夫草照糧均派。……至包收之多，窮民實受什役之剝削，然法立弊生，亦有無可如何者矣。若楚屯田督催各役，謂之把頭，其法亦與民糧同，但舊徵青銀，今俱足色。至漢川縣民糧，謂之紅糧，催役或云里長，亦云什役。楚屯蘆洲，謂之蘆課；潞藩湖課，謂之漁糧。相傳楚藩望青占田，潞藩望白占田，其催役俱謂之區頭。<sup>82</sup>

則至康熙初，漢川縣仍沿用什役（里長）催徵之舊例（雖略有變革），屯田、莊田、漁糧仍各自納課，未能整齊劃一。然乾隆十一年（1746）成書的《漢陽府志》卷一三〈地輿志·形勢〉漢川縣「五鄉八里堤院里至田畝數目」中，已詳載

<sup>81</sup> 光緒《沔陽州志》卷四，〈食貨志〉，「賦役」，頁148。

<sup>82</sup> 康熙《漢陽府志》卷一，〈輿地志〉，「里甲」。

漢川縣各垸田畝數。如其「謝家垸」條載：「自史家山嶺起，從汪家河包圍至石滾灘下轉灣，南至榔頭嶺，東至漢陽白湖橫堤底，共堤一千二十五丈，該垸建有石閘一座。垸內上田五頃六畝，中田三頃七畝，下田二頃九畝。上地一頃八十畝，中地五頃六十畝，下地一頃四十九畝三分。濱臨大河，坐落長城鄉。」<sup>83</sup> 則至遲到乾隆十一年，漢川縣已全面清丈全縣各官垸所有田畝，並劃分田畝等第。據此，結合漢陽縣的情況，我們推測漢川縣清丈諸垸田畝、按垸徵糧，應是在乾隆初年完成的。

監利縣實施田畝歸垸的辦法相對較晚。同治《監利縣志》卷四〈田賦志〉云：

監利田畝，自明萬曆時兩次清丈，田糧具有成數。崇禎末，邑經兵燹，版圖毀失。國初起科，多憑報畝。康熙四十六年，邑侯王公奉文清丈，民噪而止。監利分三十三里，糧附各里，每歲堤工，隨糧攤派。窯圻、利廳二汛居上鄉，堤短；朱河、白螺二汛，居下鄉，堤長，故有上下糧之分：上糧土較輕，下糧土較重。北鄉又有緩徵災垸，於是飛灑詭寄，糧無定里，畝無定糧，弊端百出。至道光時，漕額寢虧，莫可究詰。<sup>84</sup>

則直到道光時期，監利縣仍沿用「糧附各里」的徵科辦法，田畝數、賦額則仍據萬曆九年（1581）清丈之數。直到咸豐八年（1858），監利縣知縣吉雲樵方奉湖北巡撫胡林翼劄飭，著手清丈境內田畝。同治《監利縣志·田賦志》〈序〉稱：「咸豐時，中丞胡文忠公下令減漕，民困乃紓。然賦額所虧猶多。嗣是，乃徧行清丈，造為定冊。」其後錄邑人遊克欽〈清丈本末〉云：

咸豐八年春，奉中丞劄飭清丈，吉公乃於城內設立總局辦理，……隨於五汛分設公局十七所，憑公局舉報督丈，定棄里就垸之議，合邑通行丈量。……九月中，局乃設齊，漸漸開丈。值是年冬乾，低窪盡涸，至冬盡，合邑已丈十之六七，乃定各垸魚鱗、歸戶二冊式。魚鱗冊者，花名為經，田為緯，具載土名四至弓廣，相地勢高下分為上、中、下三則；歸戶冊者，總花名田調以便科秋徵收者也。……於是田分三則，賦錯九等，又有荒沙、湖田、湖水、灘田等項，畝有定糧，糧有定垸，錢漕堤工，俱可

<sup>83</sup> 乾隆《漢陽府志》卷一三，〈地輿志·形勢〉，「漢川縣五鄉八里堤垸里至田畝數目」，頁139-140。

<sup>84</sup> 同治《監利縣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志·湖北府縣志輯》第44冊，據同治十一年刻本影印），卷四，〈田賦志〉，頁78。

按冊以徵，而飛灑詭寄之端無自而起。<sup>85</sup>

然則，此次清田的基本原則，乃是「棄里就垵」，即放棄實際上已不能發揮作用的里甲系統，以田歸垵，將垵作為賦役徵科的基本地域單位。此次清丈後，監利縣的里甲體系完全廢棄，故同治《監利縣志》卷一〈方輿志〉於「里名、垵名、洲名」下不再記載鄉里名目，而是詳錄咸豐清丈時的垵分：中汛一百七十三垵，朱河汛一百三十八垵，窯圻汛八十九垵，分鹽汛八十六垵，白螺汛四十一垵，共計四百九十一垵。<sup>86</sup>

總之，從清初開始，江漢平原部分州縣漸次推行按田糧編排里甲的做法，並分別在康熙前期（潛江）、乾隆前期（沔陽、漢川）及咸豐間（監利）相繼完成里甲編排和賦役徵收辦法的改革。編排里甲既以田地賦稅為核心，江漢平原地區的大部分田地又都在圍垵之中，故在編排過程中乃實行按田歸垵、按垵歸鄉的辦法，「垵」乃成為賦役徵科的基本地域單位。在這一過程中，里甲制不僅未「與實際地域範圍相脫離」，恰恰是落實到了擁有明確地域範圍的「圍垵」上；而由於按戶隨田，人戶亦繫於垵，戶籍編查實有賴於對圍垵田糧的掌握，故戶籍乃與里甲體制相脫離，反而附著於圍垵之上。這樣，里甲戶籍制度遂漸次崩解。<sup>87</sup> 到清後期，至少在江漢平原腹心地帶的潛江縣，基本上不再以「里、甲」指稱士民籍屬

<sup>85</sup> 同治《監利縣志》卷四，〈田賦志〉，頁 76-79。

<sup>86</sup> 同治《監利縣志》卷一〈方輿志〉，「里名、垵名、洲名」目所記「咸豐九年清丈垵分」，頁 44-48。按：統計中汛、朱河汛、窯圻汛、分鹽汛、白螺汛五汛所管垵分，共有 527 垵；而同治《監利縣志》所記全縣垵的總數為 491 垵，與五汛合計數不符。蓋因部分垵分屬兩汛，在各汛分屬垵目中均有統計之故，故此處之總數仍取《監利縣志》所記之總數。

<sup>87</sup> 在康熙《潛江縣志》卷三〈輿地志·鄉區〉、卷九〈賦役志·戶口〉及光緒《潛江縣志續》（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湖北府縣志輯》第 46 冊，據光緒五年傳經書院刻本影印），卷三〈輿地志·鄉區〉等相關部分，均未記載里（圖）的情況，說明早在康熙中期，潛江縣即已不再以里甲編排戶籍。沔陽州雖然在乾隆初年由知州禹殿鼐主持將全州劃分為五鄉二十圖一百里，然如上文所述，其圖、里僅僅是地域單位的賦役徵科單位，絕非戶籍登記系統。在光緒《沔陽州志》之相關部分，亦未述及圖、里與戶籍登記之間存有聯繫。所以，雖然斷其為「無」非常困難，但我們仍然傾向於認為：至少在清中後期，江漢平原諸州縣很可能已不存在里甲戶籍制度。而根據嘉慶《漢陽縣志》卷一二〈戶口保甲〉、同治《續修東湖縣志》卷四〈疆域志上〉、同治《桂陽直隸州志》卷五〈賦役〉等記載，至少在清中期以後，包括江漢平原諸州縣在內的很多兩湖州縣，是以保甲作為戶籍登記之基礎的，即所謂「清理戶冊，勸行保甲」、「申行保甲之法，稽戶口者即以保甲冊為據」。惟此點涉及清代保甲法在兩湖地區之推行及其具體情況，容俟另文詳考。

居里，而逕稱為「某某垸人」。<sup>88</sup>

## 六・結語與討論

綜上所考，可以認知：（一）洪武中江漢平原諸州縣編排黃冊里甲，大抵僅可在已闢為土田、營築廛市村舍之區開展，故所編里甲主要集中在已經開發的平原邊緣低崗丘陵和平原腹地地勢較高的圍垸地區（主要沿河流自然堤分布）；散布於平原腹地低窪湖區的眾多漁戶，則並未被編入黃冊里甲系統，而是由河泊所攢造「赤曆甲冊」，編排漁戶「業甲」（以若干戶共同擁有同一份「湖業」為基礎編成的「甲」），由業甲、業戶開辦湖業、承納魚課。由河泊所管領、編排為「業甲」的漁戶，在籍屬、納課、應役方面，當與黃冊里甲戶分屬不同的系統。（二）自明初以迄明中後期，大量客民進入江漢平原，漁戶也紛紛上岸，成為明代江漢平原垸田開發的兩大主力軍，但其大部分均未被納入版籍，或即僅以「業戶」身分編入河泊所管領的「業甲」，其所墾垸田也多未徵科，或僅承納魚課（湖課、漁糧）；原已編入里甲的土著老戶也紛紛進入湖區，加入圍墾湖垸的行列，從而脫離了其原來的里甲；這些主要由客民和漁戶組成的垸民及其新墾垸田游離於官府直接控制之外，或者被割給、投獻給「王莊」（或「皇莊」）成為「莊戶」和「莊田」，或憑藉勢力成為「豪強」、「奸民」，田連阡陌而無升合之稅。（三）自嘉靖至萬曆間，地方官府不斷通過清田、新編附籍里甲等手段，努力控制新墾垸田及在其上耕作的垸民，其中，萬曆五年潛江縣的清田取消了「漁田」的特殊性，將此前稱為「漁田」、交納魚課（湖米）的部分垸田，納入官府直接控制之下，歸入「民田」之列，一例起科。在這一過程中，有部分新墾垸田起科納賦，也有部分垸民入籍

---

<sup>88</sup> 光緒《潛江縣志續》卷一七，〈人物志〉述及本縣人物籍屬居地，即多不載人物所屬之鄉里，而直接稱述其居於某垸，即稱為某垸人。如〈孝友傳〉下記「文曰明」，謂其為鄉西垸人，荊州衛籍；「謝光廷」，荷湖垸人；「何東義」，鄉南垸人；「莊鴻鐸」，鄉西垸人；「劉冕」，荷湖垸人。（頁 535-538）同書卷一五〈兵防志〉記嘉慶元年潛江縣團練鄉勇，其為首者有「長湖垸庠生吳樹炳」、朱誠（「世居潛邑之長四垸」）；咸豐年間長塹鎮十五垸紳首組織「西鄉六團」，其為首者唐廷鑒為「漳湖垸庠生」。（頁 476-477）其卷一五、一六按垸詳錄了咸豐三年蚌湖之役中潛江西鄉六團陣亡團首、團勇的姓名，如陣亡團勇中，長老垸有 442 名，長一垸 632 名，長二垸 439 名，長三垸 366 名，長四垸 312 名。（頁 481-514）凡此，似都說明至少在潛江縣，應不再以里甲作為戶籍登記的基本方式。

或由漁戶轉變為里甲編戶，但數量並不多。(四)從清初開始，江漢平原諸州縣漸次推行按田糧編排里甲的做法，按田歸垵、按垵歸鄉，「垵」乃成為賦役徵科的基本單位。在這一過程中，里甲制不僅未脫離實際地域範圍，恰恰是落實到了具有明確地域範圍的「圍垵」上，「戶」籍卻與里甲體制相脫離。這樣，原本以戶口和土地佔有相結合為基礎的里甲體制，乃變質為以田糧為基礎、以垵為具體地域範圍的賦役徵科單位，里甲戶籍制度漸次崩解。

明清時期里甲制度（以及與之相配合的賦役制度）在江漢平原各州縣的實行及其變革，很大程度上表現出里甲制度在各地區實行與變革軌跡的「共性」，如：（一）明初推行黃冊里甲制，並不意味著將地方上的各種人戶全部或絕大部分納入黃冊里甲體制中（雖然官府採取了各種嚴厲手段，檢括漏口脫戶），而是程度不同地存在某些逸出於黃冊里甲體制的戶口和田地；這些脫漏也並非全出於控制力不強或措施不嚴密，有的乃是出於制度本身的原因（如漁戶被納入由河泊所掌握的「業甲」系統）。（二）由於推行里甲制的根本目標乃在於通過控制戶口以徵科賦役，「入籍」就要「當差」，要逃避當差納賦，就必須想方設法「脫籍」、不入籍或不完全入籍。因此，里甲制之鬆動與破壞，乃是出於這一制度本身的必然，越來越多的戶口與田地脫離以里甲制為主體的官府控制系統，應是普遍的趨勢；只有少數人戶，出於提升自身社會經濟地位等目的，才會主動或被動地「入籍」。（三）人戶可以逃離、隱匿，田地卻相對固定，所以，里甲制及與之相應的賦役制度，由以人丁和田地相結合為基礎，逐漸轉向主要乃至完全以田地或田糧為憑依，也是勢所必然。「隨著里甲戶籍越來越不能實際地掌握具體的個人，賦役制度逐漸以田地為單一的徵派對象，政府編造戶籍的重點，也越來越注重田地和稅額，戶籍的內容也著重於土地和稅糧和登記和核查，人口登記的意義逐漸喪失，圖甲的編製變成以田地和稅糧為中心。」<sup>89</sup> 這種轉變也是普遍的趨勢，不過各地區轉變的進程和形式各異而已。

當然，明清時期里甲制度在江漢平原各州縣的實行及其變革，也有其自身的特點，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明代江漢平原地區逸出於黃冊里甲及賦役體制之外的民戶與田畝為數十分巨大。無法估算明代進入江漢平原的移民人口數，但「江西填湖廣」之謠已足以見出這一數字之巨及其所佔比重之大。<sup>90</sup> 雖然洪武前期進入江漢平原各州縣的移民可能大都被編入黃冊里甲，但永樂以後方進入

<sup>89</sup> 劉志偉，《在國家與社會之間》，頁10。

<sup>90</sup> 張國雄，《明清時期的兩湖移民》（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頁36-41。

的移民，大部分可能均未編入里甲。江漢平原河湖縱橫、湖群密布，生活於河湖水域以漁戶為主的各色人群更無以計算。移民與漁戶兩類人群，如果大部分皆未被納入或未被完全納入州縣黃冊里甲系統，則其數量之眾，甚至可能超過里甲戶。二是垸最終演變成為賦役徵科的基本地域單位，並在地方社會經濟生活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垸本來是江漢平原民眾修築的防洪設施，主要是通過民眾協作的方式修築起來的，規模較大，「大者輪廣數十里，小者十餘里」，<sup>91</sup>「每垸周圍二三十里、十餘里、三四里不等」，<sup>92</sup>「各垸之田，少者數百畝、千餘畝，亦有多至萬餘畝者」；<sup>93</sup>一個垸往往包括數個乃至數十個居於臺、墩或堤岸之上的自然村落。因此，江漢平原地區的垸本是以水利與生產活動為基礎的村落之間的聯合，它將位於堤岸與垸內的大小散居村落，通過圍垸、排水、垸堤修防過程中的協作，聯繫在一起，進而形成自然村落的聯盟（或「水利共同體」）。<sup>94</sup>這個系統本來與官府的里甲體制和賦役徵科系統之間並無直接關連，然在清代里甲賦役制度的變革過程中，江漢平原部分州縣相繼通過以田歸垸、按垸徵賦的改革，將里甲體制與賦役徵科落實到具有明確地域範圍的圍垸上，從而使垸實際上成為官府進行賦役徵發的基本地域單位，並在地方行政管理系統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蕭公權先生在其名著《十九世紀中華帝國的鄉村控制》的附錄〈里甲結構的變異〉中，曾從宏觀區域的角度，分析十九世紀里甲編排情況的區域差異，特別是南北方之間的不同，並將里甲制在實際運行過程中的「變異」(variations)按其對制度性規定的偏離區分為「添加型」(additive)、「削減型」(subtractive)與「替代型」(substitutional)三種類型；據此，蕭氏認為，「清朝統治者並未能在中國鄉村成功地建立起整齊劃一的賦稅徵收體系」。<sup>95</sup>在〈明代的里甲制及其在應天府

<sup>91</sup> 嘉靖《沔陽志》卷八，〈河防志〉，頁2。

<sup>92</sup> 俞昌烈，《楚北水利堤防紀要》（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卷首，汪志伊，〈湖北水利篇〉，頁14。

<sup>93</sup> 王槩，《湖北安襄鄖道水利集案》（乾隆十一年刻本，武漢大學圖書館藏），卷下，〈稟撫憲晏各屬水利歲修事例〉，頁2。

<sup>94</sup> 魯西奇，〈明清時期江漢平原的圍垸：從「水利工程」到「水利共同體」〉，張建民等編，《歷史時期長江中游地區人類活動與環境變遷專題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1），頁348-439。

<sup>95</sup> Kuang-ch'üan Hsiao, *Rural China: 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0), Appendix I, "Variations in the Li-Chia Structure," pp. 521-548. 引文見 p. 548.



的施行》一文中，黃清連先生通過對應天府屬八縣里甲制施行及其變化的考察，揭示了八縣里甲制實施與運行的多樣性，指出：「明代里甲制在城市與鄉村地區的施行，並未完全遵照法令規定的模式；不同的府、縣在施行這一制度時，並沒有一致的方式；法令本身也顯示出某些變異。」他進而以「極性」(polarity) 和「地方色彩」(localism) 來解釋應天府各縣里甲編排與制度規定的差距以及各縣間的差別：「極性」意味著在將「普遍性的」規章制度推行到各府級政區的過程中，全國各地都表現出分歧或對立，換言之，每個府在實施里甲制時，都表現出偏離甚至對立於中央政府所定規章的趨勢，全國沒有一個府或縣里甲制的實施完全符合制度的規定；「地方色彩」則是指里甲制在各地方的運行，均各不相同，從而表現出程度不同的地方特點，沒有一個縣里甲制的運行與其他縣雷同。<sup>96</sup> 劉志偉先生關於明清時期廣東地區里甲賦役制度與鄉村社會變遷的研究，則充分揭示了里甲制在廣東各府縣實施過程中表現出來的地域特點與多樣性，特別是里甲制在基層社會中的實際職能與理想化的制度設計之間的差異，認為「制度規定與立法意圖已經有相當的差別，而制度上的規定與實際施行的效果更有相當的距離。」<sup>97</sup>

上述研究及其認識是本項研究的出發點，本文在很大程度上乃是為上述認識提供了進一步的個案例證。同時，本文通過對江漢平原諸州縣里甲制運行及其變革過程的細緻考察，在已有認識的基礎上，試圖進一步明晰如下幾點：（一）明初里甲制的制度設計與規定，應當包涵非常廣泛複雜的內容，除州縣黃冊里甲系統外，還可能包括針對河湖水域及居住於其間的漁戶而設計、制定的河泊所「業甲」系統。至少在包括江漢平原諸州縣在內的湖廣地區，河泊所「業甲」管領漁戶的籍屬、納課與應役方面，與黃冊里甲戶的籍屬、納課與應役，當皆屬於不同的系統（雖然二者互有交叉重疊）。這種做法應當有其制度設計與規定上的基礎，並非僅是里甲制在實施過程中發生的「變異」或「因地制宜的舉措」。換言之，很可能在里甲制設計與創立之初，就為各種特殊區域與人戶「預留」或「設計」了較大的「制度性空間」，漁戶「業甲」制或者就是在這種「制度性空間」中創立與形成的。（二）江漢平原諸州縣在實施里甲制的過程中，主要是在已闢為土田、營造廬市村舍之區編排里甲，未得到開墾的湖澤及居於其間的漁戶則未編排黃冊里甲，而另編為「業甲」。然則，里甲制在實施過程中，不僅各府、縣之間各有不

<sup>96</sup> Huang Ch'ing-lien, "The *Li-chia* System in Ming Times and its Operation in *Ying-t'ien* Prefecture," pp. 103-156。引文見 p. 120.

<sup>97</sup> 劉志偉，《在國家與社會之間》，頁 48。

同，即便是在同一縣之內，也很不平衡：在靠近縣城的區域，里甲的編排可能較為嚴格，也比較接近制度的規定；而在遠離縣城的湖區，則可能未編排黃冊里甲，漁戶「業甲」的編排可能也不太嚴密。換言之，由於地方官府對所轄範圍內不同地方的控制程度與控制目標並不相同，里甲制的實施程度與方式也各不相同。在這個意義上，里甲制實施的「多樣性」乃是絕對的、必然的、普遍的，其「一致性」則是相對的、或然的、個案的。（三）如果說里甲制在實施之初，仍然程度不同地表現出某種「一致性」，或者說里甲制的制度性規定在其實施之初，仍然發揮了某種「規範性作用」，那麼，在其後來的變革過程中，「地方色彩」（localism，借用黃清連先生的表達）則發揮了主導性作用。明清時期，垸田開發乃是江漢平原社會經濟發展變遷的核心線索，諸多社會變遷均因之而發生，並受其制約與影響，江漢平原諸州縣里甲制的變化也不例外。在明代，圍墾垸田的客民與漁戶藉助黃冊里甲戶與漁戶「業甲」間的「制度性空隙」，以漁戶身分開辦河湖，佔有大面積的河湖水域，然後圍墾成為垸田；在「阡陌遍野」、「膏腴萬畝」之後，仍然繳納魚課（湖米、漁糧），從而最大程度地獲取自己的利益。明中後期江漢平原諸州縣相繼推行的「清田」，即重在控制此種新墾垸田及居於其上的垸民。到清代，江漢平原諸州縣在漸次推行按田糧編排里甲為中心的賦役改革過程中，實行按田歸垸、按垸歸鄉的辦法，「垸」乃成為賦役徵科的基本地域單位。凡此，都說明圍垸與江漢平原諸州縣里甲制的變革之間實有密切關聯，甚至是「引導」了後者。可以說，垸田開發與圍垸這一具有鮮明特點的「地方色彩」，在這一地區里甲制的變革過程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可以相信，在其他地區，也當有與圍垸類似的「地方色彩」，在里甲制的變革過程中發揮著同樣或類似的作用，並「引導」里甲制沿著「適應」其「地方社會內在需求」的方向演變，從而使里甲制在全國範圍內表現出更多的「多樣性」，各地區間的差別或歧異也越來越大。

（本文於民國一〇〇年八月九日收稿；一〇一年八月十三日通過刊登）

## 後記

本文由魯西奇執筆撰寫，並對全文負責，其中第二部分的討論主要依據徐斌在湖北省檔案館查閱的檔案材料及在武漢大學圖書館查閱的族譜材料而展開，並採納了徐斌的部分研究結論，故本文由二人共同署名。感謝兩位匿名評審人的寶貴批評意見和修改建議。

## 引用書目

### 一・傳統文獻

- 〈最高法院、湖北省高等法院黃岡分院對張祖蔭、陳受二等湖業所有權糾紛案的判決，1948〉，武漢：湖北省檔案館藏，LS7-2-534。
- 〈湖北省高等法院對蒲圻縣民王明新、余新祥等湖地共有權糾紛案的判決，1948〉，湖北省檔案館藏，LS7-2-302。
- 《明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4。
- 《漢川南湖林氏宗譜》，民國四年刊七修本，漢川縣田二河鎮白果村林醜才先生家藏。
- 王槩，《湖北安襄鄖道水利集案》，乾隆十一年（1746）刻本，武漢大學圖書館藏。
- 申時行等，萬曆《明會典》，北京：中華書局據一九三六年商務印書館萬有文庫排印本影印，1989。
- 沔陽《劉氏宗譜》，民國三十七年續修本，湖北省仙桃市檔案館藏。
- 俞昌烈，《楚北水利堤防紀要》，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 范欽纂，《嘉靖事例》，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第51冊，據鈔本影印。
- 陸游，《入蜀記》，《知不足齋叢書》本，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本，1999。
- 童冀，《尚綱齋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第1229冊。
- 黃岡《松湖陳氏宗譜》，民國十六年刻本，武漢大學圖書館藏。
- 黃岡《梅氏宗譜》，光緒五年（1879）樂道堂刊本，武漢大學圖書館藏。
- 黃岡《劉氏宗譜》，民國三十五年黎照堂刊本，武漢大學圖書館藏。
- 弘治《黃州府志》，明・盧希哲纂修，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上海：上海古籍書店，1961-1966，據明弘治刻本影印。
- 嘉靖《沔陽志》，明・曾儲修，童承敘纂，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據明嘉靖刻本影印。
- 嘉靖《湖廣圖經志書》，明・薛剛纂修，吳廷舉續修，收入《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0，據日本尊經閣文庫藏嘉靖元年（1522）刻本影印。
- 嘉靖《漢陽府志》，明・劉本用等修，朱衣纂，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據明嘉靖刻本影印。

- 嘉靖《興都志》，明·方遠宜修，顧璘纂，嘉靖十年（1531）刻本，國家圖書館藏縮微膠捲。
- 萬曆《承天府志》，明·孫文龍纂修，收入《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據日本尊經閣文庫藏萬曆三十年（1602）刻本影印。
- 萬曆《漢陽府志》，明·秦聚奎纂修，武漢：武漢出版社，2007。
- 康熙《景陵縣志》，清·李馨纂修，錢永續修，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刻本，國家圖書館藏縮微膠捲。
- 康熙《漢陽府志》，清·陳國儒修，李寧仲纂，康熙八年（1669）刻本，國家圖書館藏縮微膠捲。
- 康熙《潛江縣志》，清·劉煥修，朱載震纂，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湖北府縣志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第46冊，據光緒五年（1879）增刻本影印。
- 乾隆《天門縣志》，清·胡翼修，章鑣、章學誠纂，乾隆三十年（1765）刻本，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湖北府縣志輯》第44冊，據民國十一年石印本影印。
- 乾隆《沔陽州志》，清·禹殿鼇修，方弘履修，乾隆八年（1743）刻本，湖北省圖書館藏。
- 乾隆《漢陽府志》，清·陶士傑修，劉湘燿纂，乾隆十二年（1747）刻本，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湖北府縣志輯》第1冊，據鈔本影印。
- 乾隆《漢陽縣志》，清·劉嗣孔修，劉湘燿纂，收入《稀見中國地方志匯刊》，北京：中國書店，1992，第36冊，據乾隆十三年（1748）刻本影印。
- 嘉慶《湖口縣志》，清·宋庚等修，洪宗訓等纂，嘉慶二十三年（1818）刻本，武漢大學圖書館藏。
- 嘉慶《漢陽縣志》，清·裘行恕修，嘉慶二十三年（1818）刻本，湖北省圖書館藏。
- 同治《公安縣志》，清·周承弼等修，王慰等纂，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湖北府縣志輯》第48冊，據同治十三年刻本影印。
- 同治《漢川縣志》，清·德廉、袁鳴珂修，林祥瑗纂，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湖北府縣志輯》第9冊，據同治十年（1873）刻本影印。
- 同治《監利縣志》，清·徐兆英等修，王柏心纂，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湖北府縣志輯》第44冊，據同治十一年（1872）刻本影印。
- 光緒《沔陽州志》，清·葛振元修，楊鉅纂，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湖北府縣志輯》第47冊，據光緒二十年刻本影印。
- 光緒《潛江縣志續》，清·史致謨修，劉恭冕等纂，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湖北府縣志輯》第46冊，據清光緒五年（1879）傳經書院刻本影印。

## 二・近人論著

王毓銓

- 1988 〈明朝徭役審編與土地〉，《歷史研究》1988.1：162-180；後收入《王毓銓史論集》，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708-738。

尹玲玲

- 2003 〈明代的漁政制度及其變遷——以機構設置沿革為例〉，《上海師範大學學報》2003.1：96-103。
- 2004 《明清長江中下游漁業經濟研究》，濟南：齊魯書社。

石泉、張國雄

- 1988 〈江漢平原的垸田興起於何時〉，《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88.1：131-140。

周玉英

- 1992 〈明中葉福建惠安縣里甲狀況探析〉，《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2.4：46-51。

周紹泉

- 1998 〈徽州文書所見明末清初的糧長、里長和老人〉，《中國史研究》1998.1：150-165。

徐斌

- 2008 〈明代河泊所的變遷與漁戶管理——以湖廣地區為中心〉，《江漢論壇》2008.12：84-88。
- 2011 〈明清河泊所赤曆冊研究——以湖北地區為中心〉，《中國農史》2011.2：65-77。

張建民

- 1998 〈明代湖北的魚貢魚課與漁業〉，《江漢論壇》1998.5：45-49。
- 1999 《湖北通史・明清卷》，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張國雄

- 1995 《明清時期的兩湖移民》，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殷崇浩

- 1988 〈方志所見鄂境明代王莊及其危害〉，《中國經濟史研究》1988.3：39-48。

梅莉、張國雄、晏昌貴

- 1995 《兩湖平原開發探源》，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湖北省天門縣地名領導小組辦公室編

- 1982 《湖北省天門縣地名志》。

黃岡地區行政公署水產局編

1992 《黃岡地區水產志》，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

彭雨新、張建民

1993 《明清長江流域農業水利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

賀喜

2006 〈編戶齊民與身份認同：明前期海南里甲制度的推行與地方社會之轉變〉，《中國社會科學》2006.6：184-198。

楊國安

2004 《明清兩湖地區基層組織與鄉村社會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

魯西奇

2000 《區域歷史地理研究：對象與方法——漢水流域的個案考察》，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

2008 〈漢宋間長江中游地區的鄉村聚落形態及其演變〉，《歷史地理》23：128-151。

2011 〈明清時期江漢平原的圍垸：從「水利工程」到「水利共同體」〉，張建民等編，《歷史時期長江中游地區人類活動與環境變遷專題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頁 348-439。

魯西奇、潘晟

2004 《漢水中下游河道變遷與堤防》，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

魯西奇、韓軻軻

2011 〈散村的形成及其演變——以江漢平原腹地的鄉村聚落形態及其演變為中心〉，《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11.4：77-91。

劉永華、鄭榕

2008 〈清初中國東南地區的糧戶歸宗改革——來自閩南的例證〉，《中國經濟史研究》2008.4：81-87。

劉志偉

2010 《在國家與社會之間——明清廣東地區里甲賦役制度與鄉村社會》，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7初版。

鄭振滿

1989 〈明清福建的里甲戶籍與家族組織〉，《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9.2：38-44，後收入氏著，《鄉族與國家：多元視野中的閩台傳統社會》，北京：三聯書店，2009，頁 117-131。

2009 〈明清福建里社組織的演變〉，《鄉族與國家》，頁 238-253。

魯西奇、徐斌

權仁溶

- 2000 〈從祁門縣「謝氏紛爭」看明末徽州的土地丈量與里甲制〉，《歷史研究》2000.1：86-93。
- 2005 〈明代徽州里的編制與增減〉，《上海師範大學學報》2005.4：58-66。
- 2007 〈清初徽州的里編制和增圖〉，《上海師範大學學報》2007.3：100-106。

中村治兵衛

- 1995 《中國漁業史の研究》，東京：刀水書房。

Hsiao, Kuang-ch'üan (蕭公權)

- 1960 *Rural China: 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Huang, Ch'ing-lien (黃清連)

- 1983 "The *Li-chia* System in Ming Times and its Operation in *Ying-t'ien* Prefecture 明代的里甲制及其在應天府的施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4.4：103-156。



## The Operation of the *Li-Chia* System on the Jiang-Han Plain and Reforms during the Ming-Qing Period

Xiqi Lu and Bin Xu

Department of History, Xiamen University; School of History, Wuhan University

There were many variations in the way the *Li-Chia* (里甲) system was implemented and operated in different areas during the early Ming dynasty, and the system developed along different trajectories throughout subsequent changes from the mid-Ming to late-Qing. This paper is essentially a case study. We concentrate on the configuration and operation of the *Li-Chia* system on the Jiang-Han Plain including in Han-yang Prefecture (漢陽府), Mian-yang Sub-Prefecture (沔陽州), Qian-jiang County (潛江縣), Jing-ling County (景陵縣), and Jian-li County (監利縣)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ystem in each county as well as the changes it underwent.

The *Li-Chia* system implemented on the Jiang-Han Plain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was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e low hills located at the edges of the developed plains and in *yuan* (垸, “enclosed embankment”) areas on higher hinterland ground. The fishermen distributed in low-lying lake areas, who were granted government leases to fish certain rivers or lakes, and who paid the fishing tax, were incorporated into the *Yeh-Chia* (業甲) system (organized by industry) that was controlled by the “*Ho-po-suo*” (河泊所, the Fishing Tax Office), and not the *Li-Chia* system. Most immigrants and fishermen, the two main agents of cultivation of enclosed fields on the Jiang-Han Plain, were not brought under the census register and tax system, or were only required to pay a small amount of fishing tax. In the middle to late Ming dynasty, local governments took many measures to control the enclosed fields, such as inspections of the fields and organization of fishermen and immigrants under the new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During this period, part of the enclosed fields upon which taxes had been levied and a few people who lived in enclosed fields were included in the *Li-Chia* system. From the early Qing, some counties gradually adopted new taxation measures that essentially entailed calculating the number of fields and collecting of land taxes based on this number. The enclosed field gradually evolved into the basic geographical unit for the official collection of land taxes.

**Keywords:** *Li-Chia* system, Jiang-Han Plain, fishermen, enclosed field